

《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晚清詞學之建構*

吳志廉**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學部

摘 要

《公羊》學與詞學同在晚清獲得充分關注，惜學界多忽視兩者的關聯。「詞出於《公羊》」說，很可能是「某人」在《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接軌痕跡上，察覺《公羊》學與常州詞學的詮釋方式相似，才提出的一個綜合性概念。因為當時詞壇掀起了一股對唐宋詞進行政治詮釋的風氣，這種對「微言大義」的執意勘探，上下求索，與《公羊》學對《春秋》的詮釋理念如出一轍。譚獻（1832-1901）對「詞出於《公羊》」說，作出《公羊》學通於詞學「意內言外」之解釋。可知從經史之學到辭章之學，譚獻都以「經世」與「微言」作為評鑑標準，是晚清今文學派銳意入世的思想延伸，也是《公羊》學家以微言干涉世運之一大縮影。透過「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望能追溯晚清「詞學」背後的「經學」依據，藉此呈現出清人觸類旁通的深厚學養。

關鍵詞：《春秋》筆法，屬辭比事，《公羊》學，晚清詞學，龔自珍，譚獻

* 本文在業師嚴志雄教授指導下撰成，蒙兩位匿名評審人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寫作期間，筆者不時與陳建銘、張齊迎、黃若舜、黃永順諸君切磋琢磨，謹以此文紀念我們的友誼。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l.ng@hkuspace.hku.hk

一、引言

《公羊》學與詞學同在晚清獲得充分關注，惜學界多忽視兩者的關聯。漢代以降，《公羊》學長期為學者輕視，卻緣於世變而重振於晚清。常州《公羊》學派復興於莊氏家族，劉逢祿 (1776-1829) 與宋翔鳳 (1777-1860) 親承其學，後有龔自珍 (1792-1841)、魏源 (1794-1857) 張大其說，形成一股經世的學術思潮；繼有陳立 (1809-1869)、譚獻 (1832-1901)、王闈運 (1833-1916) 等輩宏揚其學說，及至廖平 (1852-1932)、康有為 (1858-1927)、梁啟超 (1873-1929)、皮錫瑞 (1850-1908) 等人出，《公羊》學內涵益為豐富。上述學人多推崇西漢今文經學，並以《公羊》學為研究核心，是以《公羊》學派與今文學派是互為表裡的關係。¹ 1903年，張之洞 (1837-1909) 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² 揭示《公羊》學為晚清學術主流之一，學人多醉心於此。值得關注的是，晚清詞壇曾出現「詞出於《公羊》」這命題，提供一個視角讓我們瞭解《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常州詞學的建構關係。作為《公羊》學家又是詞學家的譚獻，則把《公羊》學延伸至詞學討論。譚獻活躍於咸豐、同治、光緒年，一定程度是晚清學術與詞學思潮的歷史見證者，為我們考察《公羊》學與詞學的可能關係提供一個切入點。

本文指的「晚清詞學」之時段與「晚清史學」之時段 (1840-1911) 略有不同，蓋詞學必然有自身的嬗遞軌跡：「清嘉慶二年 (1797)，張惠言的《詞選》問世，這在詞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了常州詞派的興起。此後直至我國現代的新文化運動之前，常州詞派的理論基本上佔據了近代詞學界，詞學著作空前繁榮」，³ 是以本文指的「晚清詞學」時段乃以《詞選》問世之年 (1797) 作為起點，直至1911年左右。

¹ 詳見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²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頁4181-4182。

³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修訂本)》(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289。

二、《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常州詞派的潛在關係

(一)「詞出於《公羊》」說考述

據譚獻《復堂詞話》記載：

魯川廉訪（珂謹按：即馮志沂。）官比部時，予入都游從，屢過談藝。一日酒酣，忽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傳會。」魯翁曰：「然則近代多豔詞，殆出於《穀梁》乎。」蓋魯翁高文絕俗，不屑為倚聲，故尊前諧語及此。⁴

晚清馮志沂（1814-1867）轉述定盦「詞出於《公羊》」之說，據字面直解，其說大意是：詞源於《公羊》學，蓋兩者具相似意涵。然馮氏顯然出於「詞為小道」的觀念，對定盦之見，施予戲謔，譚獻嘗為之辯解，則容後再談。然而，遍翻《龔自珍全集》，都無法覓得有關論述，所以「詞出於《公羊》」說，其源頭有三個可能性：一是出於定盦之口卻沒有記錄下來，二是源於定盦的散佚文獻中，三是出於時人偽託。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一文，認為「詞出於《公羊》」說，非龔自珍一時興起的無稽之談，而是他一個自覺的詞學概念，因龔氏從不稱詞體為「長短句」，多用「長短言」（〈長短言自序〉、〈袁通長短言序〉等）代之，而「長短言」一詞恰好出自《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之注疏（大意是「伐」一詞有長言短言之別，暗寓了「伐人者」與「被伐者」的主客情況），此內證可說明「詞出於《公羊》」說，很可能出自《公羊》學家龔自珍，非後人所杜撰。⁵

然而，筆者認為這條「間接」的證據還未能充分證明此說必然出自龔自珍，但無可否認的是，不管出自誰人之口，「詞出於《公羊》」說是「某人」曾提出過的一個「命題」，凡存在過的話語大多有它的理由，我們不妨借此命題去進窺晚清詞壇的發展面貌，進一步檢驗此命題是否具有「合理性」，再反過來推敲此命題有多

⁴ 譚獻，《復堂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014。

⁵ 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收入龔自珍紀念館編，《龔自珍與二十世紀詩詞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頁174-193。

大可能出自龔自珍，相信是一個相對客觀的研究方法。

後世研究者多忽視「詞出於《公羊》」這命題，即便注意到此說，多一筆帶過，未免輕視此詞學概念所蘊含的豐富意涵。欲進窺「詞出於《公羊》」說，得從幾個脈絡展開闡述。從歷時性而言，一是廓清《公羊傳》與《春秋》的關係，以及《春秋》筆法的形成；二是疏理《春秋》筆法與詩學理論的離合關係。從共時性而言，一是考察《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的接軌痕跡；二是比較《公羊》學與常州詞學的詮釋方式。

(二)《公羊傳》與《春秋》的關係，《春秋》筆法的形成

《春秋》是孔子記載魯隱公元年 (722 BC) 到魯哀公十四年 (481 BC) 的歷史哲學著作，而《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是先後闡發《春秋》義理的著作，合稱「春秋三傳」。《左傳》長於史實闡述，偏重典章制度與名物訓詁的注釋，屬於古文經學體系；《公羊傳》側重義理闡述，務求挖掘孔子的「微言大義」，屬於今文經學體系。所謂「微言大義」，指的是孔子在簡要記載中，寓託其政治批判與社會理想，具一字寓褒貶的力量，可發揮「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⁶ 的警世作用。然而，《春秋》僅以一萬八千字涵蓋二百四十二年歷史，敘述必然簡略得很，但後世《公羊》學家深信《春秋》蘊含豐富的政治義理，西漢《公羊》巨擘董仲舒 (179 BC-104 BC) 云：「《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⁷ 於是進窺孔子微辭深意，成為《公羊》學家孜孜矻矻的使命。

那麼，為何孔子之義要如斯迂迴而不直陳？《史記·匈奴列傳》有一解釋：「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⁸ 揭示孔子為免觸忌犯諱，多用旁敲側擊之語言策略揭示歷史真相，暗寓史家褒貶，於是催生了「《春秋》書法」（或稱「《春秋》筆法」）。雖然《左傳》偏重史實考覈，但它對《春秋》筆法的描述頗為到位，《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

⁶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6，〈滕文公下〉，頁211。

⁷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威德所生第七十九〉，頁463。

⁸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110，頁2919。

聖人，孰能脩之？」⁹ 杜預將它概括為「《春秋》五例」，¹⁰ 張高評將前四例釋作「蓋《春秋》書法在修辭方面，講究措辭簡要，而旨趣顯豁；明載史實，而意蘊深遠；委婉曲折，而順理成章；周賅盡致，而不歪曲事理，此四者之語言結構特色，在用晦、尚簡、崇虛、貴曲；而晦、簡、虛、曲之風格，最易形成含蓄美與朦朧美之詩美趣味」，¹¹ 可知所謂「《春秋》筆法」，蓋以婉而微、簡而晦之辭，傳達「微言大義」（揭示歷史，褒貶政治，評判人物），從而發揮第五例的效果「懲惡而勸善」，此敘述方式具強烈的修辭意味，¹² 故如張高評所言，《春秋》曲盡其妙的「史學」筆法漸過渡至「文學」修辭，先後對詩文、詞曲、小說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最先與《春秋》筆法發生關係的是「詩」，這其實有深厚的傳統依據。《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¹³ 指出天下大亂，禮樂崩壞，採詩制度隨之廢弛，孔子才作《春秋》去承擔褒貶是非、撥亂反正的政教責任，揭示「詩」與「史」功能無異、筆法相似，可謂同源而異軌。事實上，在宋代，《春秋》筆法多與詩歌評論接軌，極大程度豐富了文學理論，不妨看劉克（生卒年不詳）如何解杜詩，《西清詩話》云：

〔劉克〕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不能知。四百餘年來，唯子美與克會耳。」因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旦至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流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¹⁴

在宋人眼中，杜甫有「詩史」美名，催化論者將杜詩逐字逐句去比附政治、坐實時

⁹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27，頁879。

¹⁰ 同前引，卷1，〈春秋左氏傳序〉，頁20-23。

¹¹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詩話筆記為例〉，頁126。

¹² 錢鍾書：「《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錢鍾書，《管錘編》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82。

¹³ 孫奭疏，《孟子注疏》，卷8，頁267。

¹⁴ 蔡條，《西清詩話》，收入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187。

事，像劉克旁徵博引，斷定杜甫〈人日詩〉一如《春秋》「王正月」句，看似尋常，實有深意存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簡而晦，《公羊傳》卻認為有「大一統」之深意。¹⁵ 同理，劉克強調此詩運用了《春秋》筆法，因此詩貌似簡潔，實則是安史之亂的災難隱喻。可見在詩學層面，不乏硬要把詩歌與歷史進行對照之論，旨在為詩歌挖掘更多現實意義，其理論立足點就是源遠流長的《春秋》筆法。這種「《春秋》眼光」詮釋法，若運用恰當，自能察人所未察，參透詩歌背後的歷史隱喻，然若操作不妥，必然穿鑿附會，一如劉克對杜詩作過多的政治詮釋。

(三)《春秋》筆法、「屬辭比事」與晚清「比興」詞學

宋代大量對杜詩的解讀亦牽扯到《春秋》筆法，¹⁶ 可見在一些古代評論者眼中，《春秋》筆法與詩筆是互為關聯，前者對於詩歌創作、詩學評論都產生深遠影響。及至清代，《春秋》筆法不唯為詩歌創作提供理論資源，¹⁷ 還一定程度刺激著詞學理論，惜此點常為學界忽視。光緒十九年(1893)左右，繆荃孫(1844-1919)在概括常州詞壇時云：

吾州乾嘉之間，才人輩出，茗珂〔張惠言〕導其先路，止庵〔周濟〕揚其清芬，趨盛軌於唐音，訂中聲於宋調。意內言外，澁長之雅故。文微義著，《春秋》之通例。淫哇既屏，厥體遂尊。¹⁸

他對於將詞體「微言大義」抉發出來的常州詞派，給予高度肯定，認為此一詮釋傾向，可溯源自「文微義著」的「《春秋》通例」，蓋指向《春秋》筆法。相類似

¹⁵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隱公元年〉，頁6-11。

¹⁶ 詳見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頁311-374。

¹⁷ 嚴志雄指出錢謙益在詩歌理論與創作上推崇褒貶是非和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詳見 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¹⁸ 繆荃孫，《藝風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7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留雲借月龕填詞圖題詞〉，頁156。

的，陳廷焯 (1853-1892) 亦主張「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¹⁹ 所謂「婉而善諷」，與《春秋》筆法之「婉而成章」極為吻合。陳氏更云：「金朗甫學於皋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多諷」，²⁰ 指出張惠言弟子金應圭，其詞以「婉而多諷」之辭，達到諷諭效果，此說察見兩師徒之詞學與《春秋》筆法之關係匪淺。此外，吳翊寅 (1852-?) 〈曼陀羅花室詞跋〉更直言：「詞雖小道，志微而顯」，²¹ 把《春秋》通例之「微而顯」納進詞學討論，進一步淡化了兩者的文體界線。清末民初的陳匪石 (1884-1959)，其詞學多沿襲常州詞派，不無參酌價值，其〈中興鼓吹序〉稱譽陳亮〈水調歌頭〉、劉克莊〈玉樓春〉：「詞嚴義正，上比《春秋》」，²² 看來寓有政治褒貶之詞，能格外得到他的垂青，他評史達祖〈雙雙燕〉更云：

如以寄託言，則「紅樓歸晚」以下六句，譏不思恢復、宴安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應自」，曰「便忘了」，曰「愁損」，曰「獨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筆。²³

此論極具示範意義，揭示詞學理論如何與《春秋》筆法接軌。史達祖詞長於詠物，其中不乏身世之感、家國之悲。史氏嘗為韓侂胄之堂吏，而韓氏曾為安內而呼籲北伐。據此，陳匪石認為此詞婉而微地揭示南宋偏安歷史，對那些不思恢復、貪圖安逸之士發出道德譴責，絕非一闕尋常的詠物詞而已。此論勾連相關史事，強調史達祖字斟句酌選用「看足」、「獨凭」等辭，是為了強化復國無望的無奈，具尺幅千里的藝術效果，一如《春秋》辭隱旨彰的修辭策略。

緣此追問，《春秋》筆法為何突然與晚清詞學構成連繫？即如繆荃孫所言，這些都是「茗珂導其先路，止庵揚其清芬」所衍生的詮釋風氣，因為在嘉道年間，先後為常州詞派建構出「意內言外」法則的張惠言、周濟 (1781-1839)，都是以「文微義著」的眼光詮釋詞作。

¹⁹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卷8，頁3976。

²⁰ 同前引，卷4，頁3867。

²¹ 吳翊寅，《曼陀羅花室詞》，收入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4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頁1785。

²² 陳匪石，《舊時月色齋詞譚》，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569。

²³ 陳匪石，《宋詞舉輯論》，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5冊，卷上，頁3619。

嘉慶二年 (1797)，張惠言〈詞選序〉云：「《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²⁴ 說明以「興於微言」見稱的詞體，能提供一條委曲深隱的抒情路徑讓賢人君子揭露歷史，蘊含寄託，此論與同是側重微言的《春秋》筆法不無遙契處。張惠言論姜夔〈疏影〉云：「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²⁵ 乃視是闋詠梅詞為哀悼北宋滅亡之作，所謂「二帝之憤」，是指「靖康之變」中徽宗、欽宗為金人所虜的歷史慘劇；論王沂孫〈眉嫵·新月〉云：「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²⁶ 乃視此闋詠月詞紀錄了作者在宋室傾覆後的深沉悲痛。這種穿鑿詞評散見於《詞選》，說明在張惠言眼中，婉轉綢繆的情愛詞與詠物詞，非純粹吟風弄月，而是折射重要政治事件的密碼暗語，屬於「興於微言」的修辭載體，讓具憂患意識的詞人立足於創傷記憶與歷史洪流，間接地敘述時事、褒貶忠奸。

同樣地，周濟《宋四家詞選》評辛棄疾〈太常引〉即云：「所指甚多，不止秦檜一人而已」，²⁷ 顯然指責屢向宋高宗進讒言的主和派；評辛棄疾〈漢宮春〉時云：「春幡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子猶記年時好夢，黃柑青韭，極寫燕安酖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²⁸ 「燕安酖毒」是指不思進取、甘於偏安的南宋君臣，「五國城舊恨」則指徽宗、欽宗慘被俘虜之事，是以周濟認為「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揭示他喜把表層無直接反映時事而本屬於吟風弄月之詞，一併坐實到歷史事件（南宋政局），讓「詞」躋身正統文學之列而享有與「詩」並駕齊驅的地位，²⁹ 這是常州詞派一貫的尊體策略，學界多有討論，不贅。

凡此，可證明繆荃孫把《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接軌的一刻溯源自張惠言、周濟，是深具卓識的，因張、周俱以「文微義著」的眼光將詞作置於顯微鏡下反覆勘查政治寓意，其操作方法不無從《春秋》筆法獲得沾溉。

²⁴ 張惠言輯，《詞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32 冊，頁 536。

²⁵ 同前引，卷 2，頁 547。

²⁶ 同前引。

²⁷ 周濟，《宋四家詞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頁 32。

²⁸ 同前引，頁 33。

²⁹ 張、周二入賦予詞體褒貶功能，讓詞體繼承漢儒、陳子昂、杜甫、白居易等人所倡之「興寄」精神，宣示詞一如詩般可干涉世運、諷諭朝政。

張惠言標舉的「意內言外」，與有關描述《春秋》筆法的文獻亦甚有淵源。《朱子語類·春秋綱領》引朱熹(1130-1200)說《春秋》，稱「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³⁰ 揭示《春秋》多借「書法」褒貶是非，不無「言外之意」。不難發現，朱熹所云「言外之意」，與張惠言所云「意內言外」，有很大程度的契合，都主張從筆法幽隱之處挖掘言外之義。即便是詮釋經典的理念，朱熹與張惠言都有相似性，《朱子語類》記曰：「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³¹ 闡述後人解讀《春秋》，實非易事，當破解筆法，還原義理，方不辜負作者「不說破」的用心。同樣地，張惠言拈出「意內言外」的詞學主張時，亦云：「今第錄此篇，都為二卷。義有幽隱，並為指發」，³² 主張《詞選》之評點（如前引例子），肩負著揭示詞作幽隱之義的使命。張惠言詞論有否受朱熹影響，實難判斷，然而，兩人思想之所以能類比，是因為朱熹相信《春秋》筆法藏有「言外之意」，一如張惠言深信詞作筆法含有「意內言外」之寓；換言之，宣示經典寓有曲折「筆法」是兩人的理論共質。因此，單從文獻淵源來看，張惠言之說非破空而來，而是有傳統憑據的。

過去研究者多視「比興寄託」為常州詞派之詮釋依據，³³ 此判斷當然無誤，誠如易順鼎(1858-1920)所言：「近世善言詞者，推武進張皋文。皋文言詞以比興為主，於古人所作，必合以當時情事，而知其用心。」³⁴ 然而，透過上文疏理，有三點是本文要補充的。

其一，「比興」發展到清代已漸與《春秋》契合。清儒章學誠(1738-1801)嘗云：「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³⁵ 「春王正月」就是《春秋》「隱公元年」起首之文，說明要掌握《春秋》之婉辭，須輔以「言在此而意在彼」之比興思維方能相得益彰。換言之，六義之「比興」與《春秋》之修辭，同側重「辭隱旨闕」，兩者可觸類旁通。章氏之論把屬於「詩歌史」的「比興」與屬於「經學史」的《春秋》統合起來，打通兩者的文類界限，洵為卓見，當是他觀察先秦以降《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離合關係而得到的總結。更重要的是，連詞學的

³⁰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149。

³¹ 同前引，頁2152-2153。

³² 張惠言輯，《詞選》，頁536。

³³ 如孫克強以比興寄託說闡釋常州詞派的詮釋傾向。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85-303。

³⁴ 易順鼎，《摩圍閣詞》，收入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3冊，〈自敘〉，頁1610。

³⁵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世界書局，1975），〈史德〉，頁46。

「比興」也與《春秋》鑲嵌起來，丁紹儀 (1815-1884) 子壻胡鑑衡〈聽秋聲館詞話跋〉：「《春秋》之義婉而明，可通比興。哀絲豪竹，中年自寫其胸懷。豔語清詞，大旨必原於風雅」，³⁶ 在論詞的氛圍下，揭示出詞學比興與《春秋》筆法秘響旁通。凡此，可說明繆荃孫之所以將《春秋》筆法與詞學理論相提並論，並非憑空捏造，而是有理論依據的：「詩歌」與「春秋」之修辭策略與紀實功能在歷史長河中經歷了「同源」→「離」→「合」的嬗遞軌跡（見前文疏理），進而有清人提及「詩」、「詞」的「比興」方法可通於《春秋》筆法，揭示兩者的融合程度已相當成熟；而「比興」方法恰是張惠言、周濟將「詞」向「詩」靠攏的理論基礎、邏輯起點，所以繆荃孫將張、周的解詞方法與《春秋》筆法扣合起來之說，背後有詩歌發展史的脈絡可尋。

其二，《春秋》學的「屬辭比事」與張、周的詞學詮釋有相似性。《禮記·經解》引孔子言，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³⁷ 提醒我們掌握「屬辭比事」，有助破解《春秋》筆法，直探微辭隱義。然何謂「屬辭比事」？張高評綜合清代學人姜炳璋（生卒年不詳）、張應昌 (1790-1874)、鍾文烝 (1818-1877)、章學誠、孫希旦 (1736-1784) 有關「屬辭比事」之說解，細加剖析後，將「屬辭比事」定義為：連接上下前後之文辭，類比對照相近相反之事跡。³⁸ 據此，張高評指出：連屬上下前後之文辭，類比，對比、比興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數十年積漸之時勢而通觀考察之，可以求得《春秋》不說破之「言外之『義』」，此之謂屬辭比事，或稱為比事屬辭。³⁹ 張高評之說深造有得，當中指出「屬辭比事」與「比興」詮釋法不無關聯，同是剖析文辭深層，以抉發文本「言外之『義』」，此說啟人心智。如胡安國《春秋傳》，成於宋室南渡，多抉發《春秋》屬辭比事之法，藉此抒匡時濟世之志（比興古今），⁴⁰ 此書提供一個側面讓我們瞭解到「比興」與「屬辭比事」可觸類而通。緣此類推，張惠言、周濟對經典詞作的詮釋，固嘗取徑

³⁶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頁2841。

³⁷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頁1597。

³⁸ 張高評，〈《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以史傳經與《春秋》書法〉，《成大中文學報》，45（臺南：2014），頁5-6。

³⁹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方苞古文義法：以《文集》之讀史、序跋為核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0（香港：2015），頁228。

⁴⁰ 胡安國《春秋傳·序》：「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1-2。

於「比興」，但其詞學詮釋法一定程度與「屬辭比事」此一傳統吻合，各舉一例闡述。張惠言論姜夔〈暗香〉云：

題曰「石湖詠梅」，此為石湖作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白石〈石湖仙〉云：「須信石湖仙，似鴟夷飄然引去。」未云：「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此與同意。首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⁴¹

〈暗香〉屬詠梅詞，起句「舊時月色」，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事，符合「比興」尤其「興」的傳統標準，為張惠言的「比興」詮釋法（比附政治）提供理論基礎。在張惠言眼中，此闕詞借范成大（1126-1193，號石湖居士）之事，寓託了作者從「入世」到「出世」之無奈、鬱抑。此一解讀，非局限於單一詞作，而是將它類比另一闕詞〈石湖仙·壽石湖居士〉，闡明〈石湖仙〉中「鴟夷」（范蠡歸隱後自號鴟夷子皮）至「槐府」（古之朝廷多種槐樹，後以槐府代稱官府）語，有深意寄焉：范成大意欲歸隱，姜夔以典故勸阻。世換時移，姜夔〈暗香〉再寫石湖，悲從中來，寄寓自己於國勢日衰之際，卻老去無能。不難發現，張惠言的詮釋法是：系統連接詞作上下前後之文辭典故，類比對照相近之文獻事跡，從而挖掘詞作筆法底下的政治微辭（作者於南宋局勢無能為力），與「屬辭比事」之詮釋理念有相近之處。

周濟論數闕〈蝶戀花〉（誰道閒情拋棄久）、（幾日行雲何處去）、（庭院深深幾許）時云：「數詞纏綿忠篤，其文甚明，非歐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縱欲，偽為君子，以惑其主，豈能有此至性語乎。」⁴² 數闕〈蝶戀花〉是出於馮延巳還是歐陽脩？向有爭議，但周濟斷定數詞為歐陽脩所作，因諸詞情志惶恐無助，仍纏綿忠篤，擇善固執（文辭如「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淚眼倚樓頻獨語」等，可互文見義），似寓託了歐陽脩置身北宋新舊黨爭中，仍秉持崇高人格、狷介節操之義。相反，周濟或據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等歷史文獻，認為馮延巳人格卑劣，虛偽縱欲，紊亂朝政。在「詩如其人」的傳統命題下，周濟認為數闕〈蝶戀花〉，必出自君子，非出自小人馮延巳。因此，周濟斷定諸詞表層雖在悲秋憐春，卻寓託了歐陽脩的政治微言、忠奸褒貶。此一判斷，是連屬詞

⁴¹ 張惠言輯，《詞選》，卷2，頁547。

⁴² 周濟，《宋四家詞選》，頁17。

作前後之文辭，再類比、對比相近相反之史事，通觀歷史時勢、作者人品而得之。此詞學詮釋法一定程度類於《春秋》學「屬辭比事」之法，同是側重文本「筆法」下的微辭隱寓。

值得一提的是，周濟除了是詞學家，亦是史學家，約於嘉慶十八年（1813），周濟有感過去晉史繁蕪浮誕，於是悉加刪裁，歷廿多載苦功，遂於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晉略》十冊。道光十二年，周濟圍繞《史記》展開闡發，撰成《味雋齋史義》二卷，其《味雋齋史義·自序》交代了寫作動機，⁴³ 周濟引用《孟子·離婁下》的話語，重申《春秋》在「事」與「史」的表層記述下，乃寓含了孔子深刻的「義」，具有一字寓褒貶的批判力量。在周濟看來，司馬遷《史記》繼承了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並不會拘泥於歷史的敘事，而是在字裡行間寓含政治批判，即所謂「自黃帝至於麟止，皆太史所寓焉」，故作此書以明《史記》之所寓。舉一例說明，按時序言，〈孔子世家〉當置於戰國四世家（趙世家、魏世家、韓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之前，⁴⁴ 然《史記》將之置於〈田敬仲完世家〉之後，似有不妥。對此，周濟連同後隨的〈陳涉世家〉闡釋其潛在用意：「陳涉何以名世家，曰：『次三代之事，終于七國，次七國之事，終于田齊。列〈孔子世家〉于田齊後者，所以終三代也。列陳涉世家于孔子後者，所以開楚漢也，是古今之大變也。孔子存三代以前之禮樂，陳涉開楚漢以後之征伐，古無先者，是以貴之也。貴陳涉而次之至聖之下，不已僭乎？』」曰：『此太史之微言大義也』」，⁴⁵ 強調《史記》之篇次安排蘊含深刻寓意，藉此突顯孔子於歷史長河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可見作為史學家的周濟，不時用《春秋》筆法的眼光去闡釋史書微言，故其闡幽抉微、比附政治的詞學傾向，一定程度從《春秋》學中獲得借鑑。⁴⁶

其三，龍榆生（1902-1966）〈論常州詞派〉：「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戶誦家絃，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

⁴³ 「昔人稱史記為太史公書，以人名其書者，明此人欲自發，舒知空言，不如實事，故取舊文自證明，古立則今悟，著見則微表，文成則指達。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之謂也。……自黃帝至于麟止，皆太史所寓焉。……則有所寓者，求其所寓者，而彼固一以貫之矣。」周濟，《味雋齋史義》，《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51 冊，頁 481。

⁴⁴ 孔子生於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53 年，韓、趙、魏瓜分晉國剩餘土地，從此韓、趙、魏稱為三晉。後來田氏竄齊則發生於公元前 386 年。若按時序言，〈孔子世家〉當置於戰國四世家之前。

⁴⁵ 周濟，《味雋齋史義》，頁 492。

⁴⁶ 《春秋》既是「經」，亦是「史」，晚清「詞史」說的盛行，是緣於「史學」對「詞學」的影響，筆者擬另撰一文闡述「史學」與晚清「詞學」的建構關係。

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為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⁴⁷ 作為席卷晚清詞壇的常州詞派，其詮釋體系之建構，也許不止一個「比興」源頭而已。透過疏理《春秋》與詩歌的離合關係，揭示常州詞派的理論依據，實可溯源自與「比興」關係緊密的「《春秋》筆法」、「屬辭比事之法」，進一步掌握他們立論的「籌碼」，可知常州詞派之所以言之鑿鑿，無懼附會之譏，並構成無遠弗屆的影響，原來有一個強大的經學傳統為他們撐腰，那就是緣《春秋》而衍生的詮釋學。

(四)《公羊》學派與常州詞派對經典的詮釋方式

前述「詩」、「史」同源、《春秋》筆法與詩歌理論的離合關係，很大程度能幫助我們瞭解晚清「詞學」與側重《春秋》筆法的「《公羊》學」之可能關係。王基倫說：「即使古文經《左傳》和今文經《公羊傳》、《穀梁傳》都認同『《春秋》筆法』的存在，但是他們對『義例』的講求，卻是前者以『事』為主，後者以『義』為主」，⁴⁸ 乃強調《公羊》學以探索《春秋》筆法底下的「微言大義」作為原則。所以大體來說，《復堂詞話》記載「某人」提出「詞出於《公羊》」說，很可能是一個用來描述常州詞派詮釋風氣的概念。其邏輯推論是，當時詞壇掀起了一股對唐宋詞進行政治詮釋的風氣，這種對「微言大義」的執意勘探，上下求索，與《公羊》學對《春秋》的詮釋理念如出一轍。雖一為「經學」詮釋，一為「文學」詮釋，表層無甚關係，但唐宋以降，「《春秋》筆法」（經學）漸與「詩學理論」（文學）接軌，及至清代它更與「詩」、「詞」的「比興方法」（章學誠、胡鑑衡之論）、「詞學理論」（陳廷焯、繆荃孫等人之論）接軌；這些縱向、橫向積累而成的條件，都為《公羊》學與詞學的連繫提供了一個契合點。因為無論是《公羊》學家對《春秋》的詮釋，抑或是常州詞人對唐宋詞的詮釋，他們都深信所接觸的經典文本，是蘊含著政治意涵與道德褒貶，但這種意涵不是直陳的，而是作者透過一種婉而微的「筆法」將它匿藏，留待精英讀者心領神會。也就是說，在繆荃孫察覺到張、周以「《春秋》眼光」詮釋經典詞作之前，「某人」早以意涵更豐富之「詞出於《公羊》」說，道出此中複合交叉的現象，不失為一個敏銳的觀察。

⁴⁷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87-388。

⁴⁸ 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396。

但概念性陳述未免抽象，不妨具體對照《公羊傳》與常州詞派的詮釋方法。先看張惠言如何評說歐陽脩〈蝶戀花〉：

「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范作乎。⁴⁹

張惠言硬要將此閨怨詞與北宋「新舊黨爭」混為一談。張氏把詞中的男女語境全轉化為君臣語境，認為「庭院深深」、「樓高不見」、「亂紅」等辭都是幽微的政治隱喻。引文的「閨中既以邃遠也」，「哲王又不寤」，俱出自《離騷》，⁵⁰自有深邃之意，蓋北宋政壇屢有小人進讒，導致君王親佞遠賢，備受蒙蔽。最後賢臣（女子）儼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不得不被君王（情郎）無情放逐，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一闕簡單的愛情詞，在張惠言對照史事文獻、相關典故的解碼過程中，字字寓褒貶，句句關時局，蘊含著深刻的忠奸之辨與歷史之嘆。

再看《公羊傳》如何詮釋桓公四年之「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⁵¹

在《公羊》學家看來，《春秋》文辭精煉得一字不苟。按照《公羊傳》的理解，春天之田獵應稱作「苗」，而今卻稱作「狩」，一字之易，實是譏諷遠去田獵的諸侯，此舉為的竟是招待賓客、豐富庖廚，可謂不務正業，驕奢淫逸。可見《公羊》學家視《春秋》為千錘百鍊的文本，絕不放棄一字一句的詮釋機會，再透過文獻的類比對照，讓聖人孔子之政治褒貶、人物評斷得以還原。

《公羊傳》這種字斟句酌、必然導向政治褒貶的解經模式，很大程度類似常州詞派的解詞取向。除了操作方法之相似，兩者衍生的弊端亦同，也就是穿鑿附會。張惠言猜燈謎般將詞體攀附政治，早在晚清惹來訾議，張祥齡《詞論》：「詞主譎

⁴⁹ 張惠言輯，《詞選》，卷1，頁541。

⁵⁰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頁34。

⁵¹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4，頁92-94。

諫，與詩同流……但不必如張皋文膠柱鼓瑟耳」；⁵² 王國維《人間詞話》：「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⁵³ 兩人道出張惠言斷章取義、牽合過甚的固執。至於《公羊傳》，雖能補《左傳》不足，揭示《春秋》大義，但不無夾雜天人感應之說，常把天視作一種有意識、有意志、有目的之神秘力量，例如對於《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之「西狩獲麟」，《公羊傳》釋作「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⁵⁴ 把「麒麟」的出現與「王」的出現連繫起來，具有孔子受命於天的含義；並提出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⁵⁵ 的結論，這些闡述成為後世《公羊》學家視孔子為「素王」、「預言家」的核心依據。而且，兩漢董仲舒、何休(129-182)的《公羊》著作，亦常夾雜陰陽五行、災異迷信的內容，非實事求是的治學產物。因此，楊伯峻才毫不客氣痛詆《公羊》學「不是穿鑿附會，便是迂腐迷信……總而言之，《公羊傳》、《穀梁傳》，不是空話，便是怪話，極少具體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⁵⁶ 上引批評不無偏激成分，但能揭示出《公羊》學派與常州詞派對經典的詮釋方式立意雖高，然若走向極端，難免衍生穿鑿牽合的弊端，兩者共同的弊端，為「詞出於《公羊》」這命題多提供一個存在於晚清的合理性。

(五)「詞出於《公羊》」說是否出自龔自珍？

雖然從現存《龔自珍全集》找不到相關論述，但研究者多根據馮志沂的轉述，認定「詞出於《公羊》」說出自龔自珍，然他們的論證過程不無瑕疵，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陳新璋與嚴迪昌。陳氏認為：「龔自珍受《公羊》論政方法的啟示，在自己的詞作中使用微言以表達深意」；⁵⁷ 嚴氏認為：「龔自珍詞在藝術手段上多用微言大義的議論」，是與他「『詞出於《公羊》』的觀念有直接關係」，⁵⁸ 這些判斷大抵對定齋詩的詮釋習慣全盤移植至其詞作解讀所得，不是說定齋詞全無政治寄託，其〈減蘭·人天無據〉、〈醜奴兒令·游踪廿五年前到〉、〈臺城路·山陬法物千年在〉，當有「微言大義」深蘊其中。然而，這些作品只佔集中少數，若據

⁵² 張祥齡，《詞論》，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5冊，頁4213。

⁵³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5冊，頁4261。

⁵⁴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8，頁711-712。

⁵⁵ 同前引，頁722。

⁵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4-26。

⁵⁷ 管林、鍾賢培、陳新璋，《龔自珍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155。

⁵⁸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508。

此判斷其詞多反映政治、議論時局，是感時憂國之載體，再反過來證明「詞出於《公羊》」說出於定盦，不無以偏概全。

因此，學界最新研究已嘗試對前賢判斷作出調整。像習婷指出定盦有詩詞之辨的自主意識，其詩多反映時事，其詞則抒懷寫情，這緣於其〈宥情〉、〈長短言自序〉所主張的「抒情」詞學觀，所以其詞是「作為其尊情、暢情的途徑，是其抒發自我、陶冶性情的工具，所以，詞於龔自珍而言也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不同於詩文的特殊存在」。⁵⁹ 誠然，定盦詞集佔絕大多數的是「愛情詞」，是私密的抒情區域，是以楊柏嶺說：「在龔氏現存一百六十餘首詞中，情愛詞占據了大半」。⁶⁰ 因此，本文認同黃坤堯的判斷：「龔自珍可能認為詞絕對是一個反映個人私隱的感情天地，同時也是難以言宣的內心感覺，低徊幽眇，不必陳義太高，亦不同於詩文所承載的沉厚的用世理念」。⁶¹ 既然定盦詞主調不是政治寄託，而是純粹的情愛抒寫，那麼陳新璋與嚴迪昌之說仍需商酌。

所以本文認為，如果要論證「詞出於《公羊》」說是出自龔自珍，倒不如採取另一個方法：既然「詞出於《公羊》」說與定盦〈宥情〉、〈長短言自序〉的「尊情」創作主張相左，⁶² 又不能高度體現在其詞集，那不妨判斷此說不是一個應用在他自己身上的「規範性」理念，而是一個對常州詞派進行概括的「描述性」概念。

此論證方法的理據是：定盦曾師承今文學家劉逢祿，專研《公羊》學，其《春秋決事比答問》、《五經大義終始論》、《五經大義終始答問》有相關闡述。此外，定盦也是一個詞學家，著有《懷人館詞選》、《紅禪詞》、《影事詞選》、《小奢摩詞選》、《庚子雅詞》，以及數篇詞序。兼是《公羊》學家、詞學家的定盦，認為《春秋》具有特殊而迂迴的「筆法」，⁶³ 且判斷《公羊》學能進窺《春

⁵⁹ 習婷，《龔自珍詞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 56。

⁶⁰ 楊柏嶺，《龔自珍詞箋說》（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 15。

⁶¹ 黃坤堯，〈龔自珍詞新探〉，頁 181。

⁶² 定盦〈長短言自序〉：「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表明其詞體創作以「尊情」為指導原則。見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 232。

⁶³ 定盦〈己亥雜詩〉：「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認為《春秋》大義蘊含在字面之下，即承認《春秋》有特定之「筆法」；定盦〈春秋決事比自序〉：「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說明他習慣透過分析迂迴「筆法」以進窺《春秋》微言。同前引，頁 537、234。

秋》大義（筆法），⁶⁴ 這意味著他對特別看重經典的潛在意涵，此價值判斷為同注重「微言大義」的「常州詞學」與「《公羊》學」提供了一個契合點。更重要的是，定盦與張惠言、周濟同處嘉道年間，他與周氏嘗有來往，⁶⁵ 也與張惠言弟子宋翔鳳結為好友，⁶⁶ 更寫了一首名詩〈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_{履恆}〉，⁶⁷ 細數常州大儒的學術專長，稱譽當地「人人妙擅小樂府（詞）」，首肯之情，溢於言表，故定盦對於常州前輩張、周的詞學主張，自不會陌生。

所以若「詞出於《公羊》」說是龔自珍之言，那麼以定盦之學養與眼光，其「詞出於《公羊》」說，或許非如馮志沂所云，僅是戲言而已，亦不能以譚獻「意內言外」一辭就能將它闡釋無遺，而是定盦對經學史與文學史的離合關係（《春秋》筆法通於「詩」「詞」比興）有一宏觀把握，⁶⁸ 也深知《春秋》具有「微文比較，出沒隱顯」⁶⁹ 之婉微筆法，並察覺《公羊》學與常州詞學的詮釋方式相似，才提出的一個綜合性概念，旨在對常州詞學的立論取向作出一個概括力強的「描述」。⁷⁰

當然，這只是為前賢要證明「詞出於《公羊》」說出自定盦之判斷多提供一個可行的論證方法。本文的立場是，無論「詞出於《公羊》」說是否出自定盦，這曾經存在於晚清的「深刻」學說，是一個非三言兩語就能闡釋無遺的複雜概念，它提供一個絕好的視角讓我們瞭解《春秋》筆法、《公羊》學說對於常州詞學之建構曾發揮著重要作用。

⁶⁴ 定盦〈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於《春秋》而為之說。漢亦質家也」。同前引，頁 64。

⁶⁵ 道光七年，龔自珍曾為周濟所繪《程秋樵江樓聽雨卷》題詩二首，詳見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311。

⁶⁶ 詳見郭延禮，《龔自珍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57、63、64、83、84、90、91、115、155、191。

⁶⁷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頁 494-495。

⁶⁸ 上引定盦〈己亥雜詩〉：「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是以「詩歌」的方式去論述「春秋」筆法，一定程度是他打通「文學」與「經學」界限的學養體現。

⁶⁹ 見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春秋決事比自序〉，頁 233。

⁷⁰ 誠如前述，張惠言等人不時將唐宋詞比附時事，一定程度預設了詞「與生俱來」就是政治內容的載體，是以「詞出於《公羊》」說，應是對此影響極大的詮釋風氣作出描述。

三、經世與微言：譚獻詞學與《公羊》學的關係

(一)譚獻的「比興」詞學

譚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是晚清著名學者、詞學家，其論詞話語散見於《篋中詞》、《譚評詞辨》、《復堂日記》以及數篇詞集序跋，其弟子徐珂於譚獻身後輯成《復堂詞話》，然其所輯多有遺漏，今人譚新紅有《重輯復堂詞話》，文獻相對完整。葉恭綽(1881-1968)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之列」；⁷¹ 龍榆生更認為譚獻是「近代詞壇之一大宗師也」，⁷² 諸人肯定譚獻主一時壇坫、開一代風氣的詞學貢獻。學界對於譚獻的詞學研究相對豐富，但大多孤立地觀照其詞學論述，鮮有結合其詞論以外的《復堂日記》、《復堂類集》、《復堂文續》、《董子定本》予以闡述。以下嘗試在譚獻全集基礎上，論證晚清《公羊》「經學」一定程度成為了譚獻「詞學」的理論資源，這種異源而同軌的思想轉移，催化「理論」與「政治」的連繫趨勢，迸發出不同文本被重新詮釋與定位的潛在力量。

一如前述，無論「詞出於《公羊》」說出自何人，譚獻對於此說，釋之為「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傳會」，他雖認為此論不無炫奇成分，然亦道出自身體會。在譚獻眼中，「詞」之所以通於《公羊》，是因為「意內言外」可作為連繫兩者的「橋樑」。所謂「意內言外」，顯然是推衍張惠言〈詞選序〉之說：「意內而言外謂之詞」。譚獻是常州詞派重要一員，在定盦所論基礎上，強調詞體某些特質可打通《公羊》的界限，我們不妨緣此探本溯源，為譚獻勾勒出一個看似獨立卻相互連繫的治學框架。

譚獻「意內言外」說，是強調詞作蘊含著豐富的言外之意有待抉發，此概念得以建構起來，需立足於《詩》、《騷》的「比興」傳統，據此法則，他認為讀者可擁有近乎「再創作」的詮釋權利、興發意志，其〈復堂詞錄序〉：「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繫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又其為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

⁷¹ 葉恭綽，《廣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121。

⁷²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146。

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⁷³主張以抽絲剝繭的「比興」眼光，抉發出詞體「意內言外」的嚴肅內容，一定程度鬆動了作者之心與讀者之心的連繫關係。可見「比興」是其「意內言外」的核心依據，若要論「意內言外」，得從「比興」談起。

除了《復堂詞錄》，⁷⁴譚獻花了畢生精力編纂當代詞選《篋中詞》，錄清代各時期詞家約 375 人，詞作數量達 948 闕，是晚清極重要的選本，冒廣生 (1873-1959) 云：「仁和譚仲修〔獻〕，循吏文人，倚聲巨擘。篋中一選，海內視為玉律金科」，⁷⁵指出其選集影響之深、傳播之廣。譚獻開宗明義說：「予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⁷⁶意欲張大以張、周為首的常州詞派。緣此，譚獻以「比興」作為去取標準，「予欲訂《篋中詞》全本，今年當首定之。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墻宇」；「檢閱止庵《宋四家詞選》，皆取之竹垞《詞綜》，出其外僅二三篇。僕所由欲刪定《篋中詞》，廣朱氏所未備。選言尤雅，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厥門庭」。⁷⁷「比興」作為一種表現手法，在詩歌發展史上一直與「政治寄託」互為隱喻產生作用，當充滿暗示性之「比興」成為常州詞派之綱領，他們所承繼的是漢儒解《詩》與清初箋晚唐詩者的價值取向。就詮釋言，常州詞派慣把風花雪月、男女哀樂等的詩歌物象都認定為深婉的政治譬喻；就創作言，他們期許時人將家國情懷「曲折」地蘊含在詩歌裡，也就是透過「比興」技巧傳達政治「寄託」。換言之，他們預設了詞體大多關乎政治，把外在景物用作純粹抒情可能性去掉，無論表層意象涉及到怎樣的物象，在他們眼中都只是用來建構「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政治隱喻。一心弘揚常州派家法之譚獻，並非只把「比興」掛在口上而已，而是透過大量相關詞評，將此概念所蘊含的力量釋放出來，附錄一臚列了《篋中詞》、《譚評詞辨》、《復堂日記》有關政治美刺、士人出處進退、反映時事之話語。

不難察覺《譚評詞辨》、《復堂日記》與《篋中詞》都有相似論述，揭示譚獻有一以貫之的詞學傾向，下文以《篋中詞》展開闡述。從附錄可知，《篋中詞》滿

⁷³ 譚獻著，譚新紅輯，《重輯復堂詞話》，收入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 2 冊，頁 1306-1307。

⁷⁴ 《復堂詞錄》是譚獻選錄由唐至明之詞選集，收詞約千闕，借此書未正式刊行，稿本藏於國家圖書館，但從〈復堂詞錄序〉可窺見其選詞理念。

⁷⁵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5 冊，卷 1，頁 4671。

⁷⁶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72。

⁷⁷ 同前引，頁 129、299。

是政治導向、強調比興之詞評，昭示詞體非作者苟為雕琢曼辭而已，而是士人刻意經營、潛心摸索的創作，自是寄寓深遙，忠厚纏綿。當然，該選集不乏直述時事之詞，如張景祁 (1827-?)〈秋霽·基隆秋感〉、鄭文焯 (1856-1918)〈摸魚兒·金山留雲亭餞沈仲夏中丞，酒半聞江上笛聲，起亂煙衰柳間。感音而作，不知覺其辭之掩抑也〉等，譚獻將它視作感時憂世的載體，自無不妥。但附錄詞評更多是預設無直接反映時事之詞啟動了「比興」隱喻機制，讓譚獻扮演著解碼者將其潛在意涵抉發無遺。

在愛情詞方面，如蔣春霖 (1818-1868)〈踏莎行〉，其表層刻劃屬「閨怨詞」，譚獻卻將其傷春情緒歸咎於「金陵淪陷事」，指咸豐三年 (1853)，太平軍血腥攻陷南京之役。按照其「戀語痴語，推之忠愛」之邏輯，「無人小院纖塵隔。斜陽雙燕欲歸來，捲簾錯放楊花入」，非僅寫庭院之凋零、婦人之落寞，而是指涉滿目瘡痍的南京，那裡連嬌小燕子都無法覓得棲身地，百姓之顛沛流離不難想見，故發出「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之深刻慨嘆。詠物詞方面，許宗衡 (1811-1869)〈霓裳中序第一·秋柳〉、姚正鏞 (1843-?)〈淒涼犯·寒鴉〉，譚獻分別視作「念亂懷生」、「念亂之言」，以詞中衰頹之草木，悽惶之鳥獸，為世變滄桑的側影；朱彝尊 (1629-1709)〈綺羅香·和宋別駕牧仲咏螢〉、錢芳標 (生卒年不詳)〈水龍吟·咏螢〉，譚獻分別視作「刺詞」、「當時貳臣幸進，詞人刺之」，乃認為趨吉避凶之螢，當指涉朝中勢利小人，說明詞體何嘗不可介入政治，發揮諷諭力量。感懷詞方面，宋琬 (1614-1673)〈蝶戀花·旅月懷人〉，譚評「懷讒」；黃長森 (生卒年不詳)〈踏莎行·秋懷〉，譚評「失職不平，婉曲可以諷矣」；馬汝輯 (1900-1977)〈二郎神〉，譚評「士屈於不知己」；馮煦 (1842-1927)〈一枝花·曉經秦郵，過故居作〉，譚評「幽咽怨斷，夢華詞境，感遇為多」。這些詞作纏綿悱惻，幽怨暗生，多透露難以名狀的複雜情緒，然其本事多被隱去，在根據不足情況下，譚獻卻一律視作仕途之反映。上文分類闡釋是為了便於論說，事實上《篋中詞》不同類別之選詞，都經常被附上有關政治歷史、仕途進退之綜合評斷。

詞之為體，本是小道，向有吟風月、拈花酒、寫愛情之深遠傳統，所以常被稱作「側豔之詞」，不必讓它承擔言志載道之責任，令詞體創作相對自由，士人能藉此抒懷寫恨、宣洩情慾，釋出一些於詩文不敢直陳的真感情。但這些真感情宜透過委婉深致的藝術手法傳達出來，因詞體創作多追求「要眇宜修」的美學，若直抒胸臆則非「當行本色」。故詞外之事常內化為詞中之情，如夢似幻，恍倘迷離，交織

成一連串有待解構的暗碼，輒衍生許多「不確定性」，誘發讀者以文化記憶、歷史經驗對不同意象群作出相應聯想。譚獻等人即根據「比興」傳統，喜把歧義性、模糊性、模稜兩可之詞，一併坐實到具體的政治語境，將常州詞派的尊體技倆踵事增華，發揚光大。

譚獻對「比興」的堅持可謂甚矣，並以此作為評騭詞集之標準。其〈笙月詞敘〉即稱該集「致兼情文，雅備比興」；其〈蘋洲漁唱敘〉云：「公東去年賦《春柳》四詩，傳唱東南。身世之感，民物之故，託興如見」；其〈留雲借月庵詞敘〉云：「世稱填詞為詩餘者，豈不以流連哀樂，推燭比興」；其〈三家詞序〉云：「賦當六藝之一，宋景喁于詞出八代而還比興十九……綺藻麗密，意內而言外；疏放豪逸，陳古以刺今……纏綿忠愛，香草之寄」；其〈願為明鏡室詞稿敘〉云：「主於風喻，歸於比興」；其〈蹇齋詞〉云：「大端則詞尚比興，小而字句各有氣類」；〈鶴緣詞〉云：「定予填詞婉麗，樂府之餘，而通於比興，可諷詠也。」⁷⁸上引充分說明，詞體深婉委曲的修辭傾向，屢被譚獻視作美人香草的寄託，並將它導向更深刻、更精邃的政治意涵，為本處於文學邊緣位置的詞體掙得合理生存空間，讓它躋身詩文行列而承擔載道致用的責任。

(二)詞學之「意內言外」與《公羊》學之「微言大義」

上文闡述了「比興」作為譚獻「意內言外」的依據，兩者互為因果構成一套政治化的詞學體系。譚獻對「詞出於《公羊》」說，作出《公羊》學通於詞學「意內言外」之解釋，那麼兩者得以連繫起來的媒介到底為何物？那就是「微言大義」，這必須從譚氏的治學歷程談起。譚獻自二十二歲起習詞，⁷⁹三十歲刻《復堂詞》，⁸⁰五十歲編成《篋中詞》與《復堂詞錄》，⁸¹而《復堂日記》亦載有他從三十一歲至七十歲之間的不少詞話。同時，詞學家譚獻亦是一位今文學者，他年幼已習《春秋》學：「夫惟董子，《春秋》大師，則儒家所傳百二十三篇不離其所

⁷⁸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1308、1309、1312、1313、1314、1318、1319。

⁷⁹ 譚獻〈復堂詞錄序〉：「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為詞」。同前引，頁1306。

⁸⁰ 譚獻〈復堂論子書〉：「三十歲時，在閩刻《復堂詩》三卷，詞一卷」。譚獻著，羅仲鼎、俞浣萍點校，《譚獻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682。

⁸¹ 馮煦為《篋中詞·序》題有「壬午秋七月」，即光緒八年（1882），時譚獻五十歲。馮煦，《篋中詞》，《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32冊，頁615。《復堂日記》：「寫定《復堂詞錄》……予選詞之志亦二十餘年，始有定本」，該條日記繫於壬午年。譚獻，《復堂日記》，頁131-132。

宗。吾生十五年而讀《春秋》，年二十而讀董子」，⁸² 西漢今文經師董仲舒，人稱董子，其《春秋繁露》發揚《春秋》之旨，因多主《公羊傳》，董子向被視作《公羊》學的奠基人。但有關董仲舒之著作，散佚不全，篇目混雜，有鑑於此，譚獻耗三十多年精力編纂《董子定本》，⁸³ 重審篇目，闡發義理，夏寅官 (1866-1943) 云：「《董子》十六篇為先生致力最深之書」，⁸⁴ 此書現被收錄入《叢書集成續編》第三十七冊，重新命名為《譚儀所敘董子》，後有錢基博之序，錢氏對此書雖稍有微詞，然亦肯定此書「綱舉目張，附萼相銜，然後董子之書，神明煥然」。⁸⁵ 在譚獻看來，董仲舒於抉發孔子意旨貢獻極大，值得耗時間鑽研，嘗云：「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為經，豈徒師儒之望」；「讀董子《實性》諸篇。深明聖誼，孟子書遜其粹矣。《五行》等篇論陰陽之理，深明天人之故、德刑之原，觀其《對策》，宏綱皆在於是。大儒之不負所學也」；「董子為《春秋》第一師。故雜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於陰陽五行，大義微言，洞達天人之故，固當鼎足孟、荀，覺賈生尚多粗粗」。⁸⁶ 可見譚獻不時將董仲舒上攀孟、荀，甚至認為洞悉天人消息的董子，比孟子更得《春秋》深意，這些論述固是一家之言，然譚獻於董子的頂禮膜拜，可資說明他一生致力數十載、用功極深的是鑽研董子《公羊》學。

董仲舒《公羊》學，一如後世《公羊》學家般重視《春秋》大義，其《春秋繁露》云：「《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大義之所本耶」，⁸⁷ 並據此提煉出「孔子素王說」、「《春秋》為改制之作」、「三統說」等影響深遠的《公羊》學理論。⁸⁸ 具體文辭上，董仲舒《春秋繁露》能掌握《春秋》筆削之意，據余治平《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的研究，⁸⁹ 可知董仲舒從「常辭」、「移其辭」、「況辭」、「去明、著未明」、「婉辭」、「微其辭」、「溫辭」、「惡戰伐」、「辭指關係」、「尤賤尤貴之辭」、「不君之辭」、「不子之辭」、「諱大

⁸² 譚獻，《譚獻集》，〈董子敘〉，頁 131。

⁸³ 「始從事于咸豐戊午六月，卒業于光緒壬辰六月」。同前引，頁 132。

⁸⁴ 夏寅官，〈譚獻傳〉，收入錢儀吉等編，《清碑傳合集》第 4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卷 51，頁 3745。

⁸⁵ 錢基博，《譚儀所敘董子》，《叢書集成續編》第 3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9），〈後序〉，頁 624。

⁸⁶ 譚獻，《復堂日記》，頁 6、218、14。

⁸⁷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 12、143。

⁸⁸ 詳見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162-242。

⁸⁹ 余治平，《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上海：上海書店，2013），頁 291-357。

惡之辭」、「事辭同異」、「詭辭」、「慎於辭」、「無達辭」、「奪繼位辭」、「誅意不誅辭」、「君子辭」、「內事起外辭」、「複辭」的視角，突出孔子旁敲側擊、指桑罵槐、筆削是非曲直的語言藝術，揭示《春秋》如何對君王朝臣作出「政治褒貶」，並發揚孔子的「治國理念」。換言之，董仲舒解讀《春秋》每一字、每一句都斟酌再三，再援用「屬辭比事」之法比照史事文獻、相關言辭，旨在剖開文本表層，採取曲折的言外之意——「微言大義」。

專研董仲舒的譚獻，嘗云：「閱莊先生《春秋正辭》，此絕業也。兼采程伊川、胡康侯，或者《尚書既見》之意乎？博大深至，條舉件繫，卓乎屬辭比事之教」，⁹⁰ 稱許《公羊》學家莊存與 (1719-1788) 之餘，宣示擅用「屬辭比事」之史家，可達到「博大深至，條舉件繫」之境，能有條不紊地挖掘經典深意。這種評價標準、詮釋意識很大程度承繼自《公羊》學巨擘董仲舒。長期耳濡目染，側重「微言大義」的《公羊》學全方位滲透至譚獻的骨髓肌理，其〈論子書〉云：「予之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⁹¹ 以《公羊》學的標誌性特徵——挖掘「微言大義」——作為治學目標，令他治經史、治文學都傾向抽絲剝繭地抉發文本深邃之義，是以《清史稿》言譚獻：「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⁹² 不妨一窺他如何具體而微地側重大義闡發。

譚獻〈名理〉云：「未有考證，先有義理，孔門所謂微言大義，皆義理之學」，強調治學當以義理為歸宿，考證僅是工具。其〈蒿庵遺集敘〉云：「〔莊械〕時時以微言發其素尚，不求凡人之知也」，肯定莊械 (1830-1878) 的經學研究能夠縝密地闡發微言。其〈雙研齋筆記敘〉云：「聲音文字，以通於微言大義之郵……以告後之求微言大義者」，⁹³ 說明文字訓詁、古音釐探固是入門之徑，但更關鍵的是藉此挖掘要義閎旨。「欲撰《復堂釋聞錄》，始事於今月之朔。蓋雜識經疑，或於微言大義有所窺，則記之」，⁹⁴ 揭示譚獻治經史的習慣是稽查有無大義深蘊其中。「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予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例，鯁理其微言大義，以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途徑」，⁹⁵ 譚獻表明欲透過考據手段而獲得經學真諦。譚獻「讀《中論》。偉長漢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

⁹⁰ 譚獻，《復堂日記》，頁3。

⁹¹ 譚獻，《譚獻集》，頁679。

⁹²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86，〈譚廷獻傳〉，頁13441。

⁹³ 譚獻，《譚獻集》，頁139、151、160-161。

⁹⁴ 譚獻，《復堂日記》，頁5。

⁹⁵ 同前引，頁39。

大義，昭若發蒙……寓意托諷」，⁹⁶ 乃激賞《中論》擅於抉發儒學寓託，立意甚高。「宋於庭先生《論語說誼》。《公羊》專門之學，由大義以通微言。《論語》二十篇，子夏等撰，集先聖微言，大校明《春秋》之旨，標性道之教」，⁹⁷ 宋翔鳳以《春秋》之義貫於《論語》，認為兩者可互為闡釋，進窺孔子之義，譚獻或受其論影響，判斷《論語》藏有幽微的政治訊息。「〔溫煇莊〕《彖傳論》斗亂不亂，有物有序，而言外之旨尤廣。《彖象論》大義微言，同條共貫……經說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故隱寓其中」，⁹⁸ 譚獻認為見微知著的《易》學義理，可以有系統、有條理地折射出一代典章制度、歷史掌故。其〈周易通義敘〉亦云：「〔莊棫〕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如讀緯，以為微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⁹⁹ 指出莊棫為推算天人消息，乃參照具迷信色彩的緯書，對於此法譚獻並無異議，顯然以有無微言大義判斷著作優劣。其〈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我朝通儒輩出，以名物訓詁求微言大義於遺經，尋厥濫觴，實始於密之先生之《通雅》」，¹⁰⁰ 認為清人通過考據探得要義的治學精神，可溯源自方以智。相反，譚獻「閱《九經古義》。大都是正文字，未及大義微言，於『古義』之目未滿分量耳」，¹⁰¹ 對於僅止步考據而未能進窺義理之學，是語帶鄙夷的。更甚者，「假藹人行篋《天演論》讀畢。西學中之微言大義，殊有精邃，不敢易視」，¹⁰² 即便是西洋著作，譚獻首要關注的仍是其表層下有無深意。對於文學，其〈明詩〉亦云：「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¹⁰³ 「閱《樂府詩集》。南朝兵爭奢亂，嘗於《吳歌》、《西曲》識其懷生念亂之微言」，¹⁰⁴ 可見從經史之學到辭章之學，譚獻都以「微言大義」作為評鑑尺度，不吝稱譽一些能從隱晦之辭挖出深邃之義的著作，反之則受到其訾議。

進而稽察譚獻的詞學取向，不難察見其詞學僅是隸屬其學術下之一環。譚獻〈學宛堂詩敘〉云：「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時變，風論政教之失，得綢繆婉篤於倫理之中。遇之如近，而尋之實深，此誠足以

⁹⁶ 同前引，頁 94。

⁹⁷ 同前引，頁 157。

⁹⁸ 同前引，頁 161-162。

⁹⁹ 譚獻，《譚獻集》，頁 13。

¹⁰⁰ 同前引，頁 135。

¹⁰¹ 譚獻，《復堂日記》，頁 312。

¹⁰² 同前引，頁 403。

¹⁰³ 譚獻，《譚獻集》，頁 8。

¹⁰⁴ 譚獻，《復堂日記》，頁 75。

通《春秋》之教旨也」，¹⁰⁵ 認為世變文學當發揮諷諭傳統，以《春秋》辭隱旨閔的語言策略達到經世效果，這比直陳其事的文學更具批判力量，此論可作為其文藝觀的核心綱領。從附錄一可知，《篋中詞》評蔣春霖〈渡江雲〉為「詞當作於庚申。前使李謨事，後闕以天寶應之，鈎鎖精細」，譚獻根據文辭典故「李謨」（因戰亂飄泊的唐朝樂工）、「天寶」（天寶年爆發安史之亂，大唐由盛轉衰），判斷此詞作於咸豐十年庚申（1860），是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火燒圓明園，此詞揭示內憂外患的史實，不無諷諭朝政日衰的意味。譚獻稱許此詞「鈎鎖精細」，其實他的詮釋眼光也稱得上「鈎鎖精細」，系統地透過文辭、典故、文獻的類比勾連，精細推敲詞中微言隱義，並將它落實為政治褒貶，深得《春秋》學「屬辭比事」之法。此外，《篋中詞》評林蕃鍾（1746-1784）〈玉樓春〉為「微詞可悟」；評王廷鼎（1840-1892）〈玉京秋〉乃「託興幽微」；評汪初（1777-1808）〈湘月〉得「意內言外」；評葉英華（1802-1865）詞「託興幽微」；評莊棫〈鳳凰臺上憶吹簫〉「消息甚微」；評張琦（1764-1833）〈摸魚兒〉「諷刺隱然」等等，都極側重幽微詞體背後的可能寓意，極盡索隱探蹟之能事。譚獻此番詮釋傾向，同時體現在其論詞之序，其〈微波詞敘〉：「卷中有句云：『人為傷心才學佛。』予舉似邁孫，以為倚聲家觸類之微言在是矣」；其〈秋夢庵詞敘〉云：「煙柳唱危闌之倚，亂鴉送歸夢之濃。識忠愛之微言，固怨悱而不亂」，¹⁰⁶ 乃不厭其煩地為詞體鑲嵌更深厚的政治微言。

如果上述類比還不夠明顯，還有數則材料可證譚獻的《公羊》造詣統攝著其詞學論述。一是其〈井華詞敘〉云：「國朝文儒微言大義之學，推極於文章之正變，於是乎倚聲、樂府無小非大，《雅》、《鄭》之音昭昭然白黑分矣」，¹⁰⁷ 所謂「國朝文儒微言大義之學」，顯然指向以《公羊》學為核心的今文學派，說明其學風所披，主導了文學思潮，即便是倚聲小道之「詞」，都以積極推動政教、弘揚微言為宗，可見晚清學術風氣影響之深廣；二是其〈亡友傳〉云：「〔莊棫〕讀書好微言大義，口吃，善言名理，學通《易》、《春秋》，踰冠著書，以董子《蕃露》為師……後有哀憤，則託於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為長短句，皆是物也」，¹⁰⁸ 將莊棫「微言大義」之學術與「回曲其辭」之詞作相提並論，顯然將兩者視作緊密的唇齒關係。對此，馮煦〈篋中詞序〉一語道破譚獻之用心：「是選與

¹⁰⁵ 譚獻，《譚獻集》，頁25。

¹⁰⁶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1130、1311。

¹⁰⁷ 同前引，頁1309。

¹⁰⁸ 譚獻，《譚獻集》，頁251。

青浦王氏、海鹽黃氏，頗有異同，旨隱辭微，且出二家外」，¹⁰⁹ 指出《篋中詞》不同於一般的清詞選本（王昶《續詞綜》、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而是以「旨隱辭微」作為選詞基準，這不能不溯源自譚獻的學術淵源。

還有一條材料可窺視譚獻的《公羊》學如何主宰其文藝觀，並能藉此解釋他為何偏嗜「意內言外」的文學作品。其〈蒙廬詩敘〉云：「知人論世之學，亦通於《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教，文儒修辭，未有不可推大者邪」，¹¹⁰ 除了披露出經學與文學得以交融外，更重要的是，「所見、所聞、所傳聞」是《公羊》學專有術語，即是「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簡稱「三世異辭」，三見於《春秋公羊傳》。¹¹¹ 「三世異辭」具有歷史變易之特質，是後世《公羊》學者「三世說」之立論基準。「異辭」之採用，是因為時代遠近不同，史料掌握詳略不同，文字處理因而不同，若時代愈近，孔子因懼禍而有所忌諱，故多採用隱晦之說法，¹¹² 這類於《公羊傳》提倡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¹¹³ 因此，《公羊》學者在詮解《春秋》經文時，特別側重不同敘述方式背後所隱藏的微言，往往於簡單文句闡發出重要的思想意涵。換言之，孔子採「異辭」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得已」，這自然讓我們憶起張惠言「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之說，譚獻非但為此說作一延續，更為此說提供一個深厚的哲學基礎；他強調文學解讀需秉承「知人論世」法則，以窺見賢人君子「不得已」的忌諱，藉此抉發其背後所深隱的政治寓意，一如《公羊》學家側窺孔子「異辭」背後的政治微言。

可見譚獻認為經學與文學之詮釋都要瞭解語境、體貼人性，這種「不得已」之理念高度體現在其文藝觀。就詩學而言，其〈小雲巢詩錄敘〉云：「長言永歎，發為歌詩，獨弦之哀，變徵之中，出於不自知，成於不得已」；其〈懷佩軒詩敘〉云：「夫《風詩》肇興，大率勞人思婦，放臣逐子，有難言之隱，託物以寓其意，怨思深矣……謂當世不足與莊語，姑託為男女贈答離別之作，以摠怨思，此亦美人香草，不得已之心也」；〈金亞匏遺詩敘〉云：「《風》之變，變之極者，所謂不得已而作也」；〈幸草亭詩敘〉云：「流連身世之所遭占，所謂不得已而作者，詩

¹⁰⁹ 馮煦，《篋中詞》，頁 615。

¹¹⁰ 譚獻，《譚獻集》，頁 177。

¹¹¹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30-31、83-84、716-717。

¹¹²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15-16。

¹¹³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224。

數百篇，往往如見古人」。¹¹⁴ 就詞學而言，譚獻評莊棫詞「向序其詞有曰：『閨中之思，靈均之遺，則動於哀愉而不能已』」；其〈井華詞敘〉云：「乃以可言者寄之詩，一言當言未及得言者，脈脈焉以寄之詞」。¹¹⁵ 這些論述為豔詞提供一個正當解釋，說明士人的政治訊息之所以不直陳，是因為懼於犯諱觸忌，為免有違「溫柔敦厚」的詩教，才「不得已」以美人香草的修辭策略進行託寓，為「冶豔」之詞注入致用載道的新血，讓其體益尊，道益明。可見譚獻之所以推崇透過「比興」傳達「意內言外」之詩歌，除了想捍衛含蓄蘊藉的詩歌美學之外，還因為受到《公羊》學影響，他主要借《公羊》「三世異辭」之說，強調「知人論世」的重要性，並藉此直探作者「不得已」背後的政治寓言。此番思維模式，讓詩歌詮釋提昇到經學詮釋之層次，達到一定的理論高度，是其學術涵養的高度體現。

綜上，可知譚獻以「比興」作為其詞學立足點，藉此進窺古今詞作的政治寄託，也就是常州詞派一再強調的「意內言外」。今文學者譚獻，其治學模式深受《公羊》學影響，於經史之「微言大義」無不執意求索，這與其對詞體「意內言外」之勘探如出一轍。要之，譚獻對「詞出於《公羊》」說，作出《公羊》學通於詞學「意內言外」之解釋，這緣於兩種學說對「微言大義」的共同追求，亦緣於譚獻既治《公羊》也治詞的生命歷程。

(三)「經世致用」之《公羊》學與詞學

上文闡述了譚獻的學術如何主導其詞學，不妨以此視角釐探兩者之可能關係。從譚獻的詞學話語可知，凡是與歷史政治有關的詞作都能得到他的垂青，說明他念茲在茲畢竟是文學的政教功能，這大抵可溯源自其經世觀。譚獻作為晚清《公羊》學派之一員，與常州學派成員素有來往，¹¹⁶ 故極推崇以《公羊》學為中心的常州學派，其《復堂日記》嘗列《師儒表》，¹¹⁷ 分十一類品評清代學者，按次第為：絕學一、名家二、大儒三、通儒四、舊學五、經師六、文儒七、校雠名家八、輿地名九、小學名家十、提倡學者十一。當中「絕學一」乃包括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等《公羊》學家，更認為推動《公羊》復興之莊氏家學「精於

¹¹⁴ 譚獻，《譚獻集》，頁155、175、184、196。

¹¹⁵ 譚獻，《重輯復堂詞話》，頁1256、1309。

¹¹⁶ 詳見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譚獻與常州學派〉，頁110-124。

¹¹⁷ 譚獻，《復堂日記》，頁28-31。

惠，大於王矣」，¹¹⁸ 表彰其學勝於乾嘉名儒惠棟 (1697-1758)、王鳴盛 (1722-1797)，這是極高的稱譽，其膜拜之情可謂甚矣。《復堂日記》中，更不時稱許學有專精之《公羊》學家，如「閱《春秋正辭》。莊先生書多未竟之業，然宏綱畢舉矣」；「閱劉申受先生《說公羊》諸書。如寒得裘，如客得歸，耳目神志皆適」。¹¹⁹ 因此，當莊棫將譚獻納進常州學派，後者難掩得意之情：「莊中白嘗以常州學派目我，諧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當也」，¹²⁰ 雖謙稱愧不敢當，內心喜悅溢於言表。凡此，錢基博 (1887-1957) 對譚獻的描述頗為客觀：「以吾觀於復堂，就學術論，經義治事，蘄向在西京，揚常州莊氏（莊存與、述祖、綬甲祖孫父子）之學；類族辨物，究心於流別，承會稽章氏（學誠）之緒。惟《通義》徵信，多取《周官》古文，而譚氏宗尚，獨在《公羊》今學」，¹²¹ 精要道出譚獻的學術貢獻在於高揚今文經學之旗幟、復興《公羊》學之墜緒。

乾嘉學派側重章句訓詁，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之考據為尚，然其研究多與政治現實脫軌，有鑑於此，晚清今文學者嘗試矯正乾嘉學風之失，賦予經史「經世致用」的使命，迸發出以學術介入政治之時代思潮。首先，《公羊》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之鮮明特徵，於世變之際，其學說多能釋出「以經議政」之批判力量，這種變易的歷史哲學屢為敏銳之思想家利用、改造，乃至於大膽詮釋，形成一套反映時代前進脈搏之革新學說。¹²² 清中葉以降，今文學派發軔於常州武進縣，此派由莊氏家族開其風氣，他們特意標舉《春秋公羊傳》之「微言大義」，並透過宗族血緣的連繫力量而取得豐碩的科舉成績，漸形成一股經世的學術思潮，並以迂迴的方法抨擊政治。¹²³ 嘉道年間，龔自珍、魏源張大其說，每借《公羊》學針砭時弊，力主改革，為當時學界帶來極大衝擊，是以梁啟超云：「〔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¹²⁴ 對此「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潮，錢穆 (1895-1990) 有一扼要概述：「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

¹¹⁸ 同前引，頁 4。

¹¹⁹ 同前引，頁 21、41。

¹²⁰ 同前引，頁 44。

¹²¹ 同前引，〈序〉，頁 5。

¹²²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46-47。

¹²³ 詳見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頁 74-79。

¹²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64-66。

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於《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¹²⁵ 極力表彰定菴於常州學派發揮著樞紐作用，掀起一股經世議政之學術熱潮。

及至光緒年間，廖平、康有為更把孔子視作萬能之「預言家」。諸人大膽懷疑東漢晚出之「古文經」皆為劉歆偽造，繼而斷定六經全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旨在全盤瓦解六經之「信史性」；既然六經皆出自孔子的人為加工，那麼六經有關周朝歷史、禮樂制度的記載都不能當成「史料」看待，因為孔子只是借一些歷史敘述去建構其治世「寓言」，也就是今文經學一再強調的「微言大義」。¹²⁶ 像康有為認為《公羊》的「三世說」是寓託了孔子為萬世制法的藍圖，故以「三世說」闡述從「君王專制」到「君王立憲」再到「民主共和」是天下萬國的共同規律，乃以偷樑換柱的手段為其維新改革提供哲學基礎。¹²⁷ 可見康有為的治學理念是「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¹²⁸ 具有強烈的預設性、目的性，容易為覓得改革依據而扭曲經典，並將學術視作政治的附庸，使經史研究失去了自主性，雖然不能「求真」，卻能「致用」，可作為高呼改革、救亡圖強之一大利器。

譚獻一生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目睹清王朝轉衰並走向沒落，其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中法戰爭等動亂，都讓他體會深刻：「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鮮民之痛，不死於窮餓，不歿於賊，不溺於海，皆幸耳幸耳」，他曾「慨乎島夷、索虜，兵革相尋，天下因之鼎沸，民命幾於剝絕。雖《春秋》紀載，弑君滅國，有其過之」，¹²⁹ 無奈地認為戰亂頻仍、家國淪喪的晚清局勢可比擬春秋亂世。歷經世變，無疑強化了譚獻的憂患意識，故他與上述《公羊》學家多有切磋交流，《復堂日記》就屢提及莊存與、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人及其著作，¹³⁰ 對於他們標舉「通經致用」之旗幟了然於胸。

譚獻作為《公羊》學家之一員，大抵順應著今文學派之學術思潮，將其致用理

¹²⁵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590-591。

¹²⁶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1987），〈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詮釋〉，頁 61-208。

¹²⁷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頁 250-254。

¹²⁸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頁 11。

¹²⁹ 譚獻，《譚獻集》，〈復堂論子書〉，頁 681；〈古詩錄敘〉，頁 16。

¹³⁰ 如譚獻極推許龔自珍及其著作，詳見譚獻，《復堂日記》，頁 3、4、20、21、28、31、35、41、45、46、54、59、64、72、124、141、209、215、218、230、257。

念一以貫之，以實際言辭回應動盪時代的急切訴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重要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¹³¹ 指出常州經學與常州文學得以交融無礙，構成內在連繫，究其因由，這很大程度是緣於政局動盪，那時的經學與文學都急需貫徹淑世精神以回應風雨飄搖的世代。此論用來描述私淑常州學派之譚獻亦頗為恰當，從附錄二可知，無論是評詩文，談經史，譚獻亦高懸了一個「經世致用」的價值觀作為評鑑基準，其〈明詩錄敘〉、〈謝氏世雅集敘〉、閱《圍爐詩話》均提及「詩史」概念，與《篋中詞》多次提及的「詞史」概念（見附錄一）互為印證，如他評王憲成（生卒年不詳）〈揚州慢〉云「齷齪既壞，海氛又惡，杜詩韓筆，斂抑入倚聲，足當詞史」，揭示其冀望以詞作反映政局板蕩、百姓屈辱的文藝觀。譚獻〈金元詩錄敘〉、〈小雲巢詩錄敘〉、〈春暉草堂詩敘〉亦肯定寓有「憂生念亂」之詩文，不難察覺「憂生念亂」一辭，亦常見於其詞話論述（見附錄一），如他評鄧嶠筠（1776-1846）《雙研齋詞》云「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以新亭之淚，可以規世變也」；相類似的，譚氏評蔣春霖〈浪淘沙〉云：「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惰廢而作」，乃稱許一些憫時憂國的詞體。此外，譚獻要求詞體以諷諭美刺的方式介入政治，如他評王沂孫〈掃花游〉為：「刺朋黨日繁，風刺」、評錢芳標〈水龍吟〉為：「貳臣倖進，詞人刺之」、評張琦〈摸魚兒〉為：「諷刺隱然」，都將詞體視作干涉世變的致用工具，這些話語於前文屢述，不贅。可見譚獻要求詞人超越個人榮辱得失、男女哀樂的私情，展現與家國興衰相關的政治情感，也就是規範著創作者從「私」的抒情區域提昇到「公」的抒情區域，主張面對世變的知識分子，即使不能站在最前線捍衛家國，也應設法以詞體作為諷諭美刺、描繪戰亂、凝聚民心、鼓吹抗敵的利器，從而釋出強大的經世能量。

從附錄可知，此番價值趨向實濫觴於譚獻的致用觀：「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為體」、「獻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實，曰有用」，並自我期許：「通經致用，命世儒者」、「讀有用書、成偉人」，可見其政治思維很大程度主導其審美旨趣、經史理論，明乎此，就能理解為何他一再嚴厲批判「無用之學」。像〈明詩錄敘〉斥「鍾、譚為亡國之詬」，¹³² 認為追求幽深孤峭的竟陵詩派迴避現實，脫離致用，必須承擔亡國之責。其〈徐先生遺文跋〉云：「讀徐先生此篇，意內言外，可以摧陷廓清剽賊之文、虛僞之文、空言無事實之文、諧笑酬酢俳優之文，皆如大風之吹

¹³¹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頁 36。

¹³² 譚獻，《譚獻集》，頁 19。

垢」，¹³³ 乃藉徐文攻詆一些無病呻吟、故弄玄虛之文，其言辭之激烈，當是針對文壇末流而言；在閱《顏氏學記》時，又道出「聖緒茫茫，無用之言日出，晦盲否塞，誰為夜行之燭」，¹³⁴ 世變日亟，學界卻充斥無用之學，令譚獻扼腕難過，他甚至認為：「有宋之世，文士好多言，蘇氏父子最傳，最無實用」，¹³⁵ 獲文壇尊奉的蘇氏父子，也因其作不達實用標竿而被訾議。

除了消極地批評，譚獻於〈衢言〉、〈續衢言〉¹³⁶ 花了相當篇幅主張「理墾荒，束胥吏，止淫祀，戒奢侈」的政治改革，並就著浙江鹽運與稅收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望能達到「有鹽利而無鹽弊」、「安民生而無漕弊」的正面效益，不失為有用之言。此外，譚獻亦有自省的一刻：「念劬來，談及俄國有注《禹貢》者，證明雍田上上。有注《史記》者，於紀傳中戰地皆有圖，考形勢，求出入向方，深辨是非……吾人之不能專心於圖籍以求實用，愧乎不愧？」¹³⁷ 目睹晚清盛行的地理學及海外著述，深愧不能為此盡一分力。1896年，上海成立《時務報》，譚獻認為此報「所載《盛世元音》及重譯《富國策》，此皆有實有用者」，¹³⁸ 對於其緊貼時代需要的題材稱譽有加。凡此，《清史稿》稱譚獻：「少負志節，通知時事。國家政制典禮，能講求其義」，¹³⁹ 洵為的評。當然，僅用致用與否的尺度評斷詩詞、臧否經史，文學最根本的藝術本質、抒情需要，以及學術的自主性難免遭到貶損，但這些話語有力揭示出，譚獻強烈的經世傾向，是晚清今文學派銳意入世的思想延伸，也是《公羊》學家以微言干涉世運之一大縮影，諸因素深切相關，讓我們不能孤立地瞥視其詞學觀，否則難免見樹不見林。

四、結語

本文以「詞出於《公羊》」說作為切入點，釐探《春秋》筆法、《公羊》學說與晚清詞學的可能關係，龔鵬程〈晚清詩人諷寓的傳統〉說：「常州學者論詞，本是要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見《篋中詞》三）的。葉恭綽稱此說『開近三十年

¹³³ 同前引，頁 213。

¹³⁴ 譚獻，《復堂日記》，頁 91。

¹³⁵ 同前引，頁 97。

¹³⁶ 譚獻，《譚獻集》，頁 10-12、125-127。

¹³⁷ 譚獻，《復堂日記》，頁 386。

¹³⁸ 同前引，頁 386。

¹³⁹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 44 冊，卷 486，〈譚廷獻傳〉，頁 13441。

之風尚』。在詩，也是如此……他們是用治經的方式來研究詩詞的。由公羊家的推察微言，而漸著重辭章的比興。比興的方法，自來存在著，詩人們也不斷地運用著；但從沒有一個時代像這樣刻意提出，成為創作的準繩，而鼓蕩成一時風氣的」，¹⁴⁰ 不唯是常州學人，鮮有晚清文人不對盛極一時的《公羊》學有基礎瞭解的，也許《公羊》學對文學的籠罩式影響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值得再深入挖掘；本文在闡述過程中，多次涉及到「比興」概念，但筆者絕非將「比興」與「《公羊》學」置於一個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將二者視為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揭示晚清詞論家之所以大張「比興寄託」的旗幟，背後是有其學術思潮推動著的，若孤立地觀照詞學發展難免忽視了這層連繫。透過研究，望能察見兼是《公羊》學家、詞學家的學者，其學術涵養如何過渡到詞學理論，亦提供另一個側面窺見晚清詞學與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饒宗頤〈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云：「清以前，能詞者為文人為才人，清則多為學人，為經師，至是倚聲一道，與學術通而為一。……此竅一通，文學與學術隔閡之藩籬，遂徹底打破，不僅兩者之間，了無罣礙，且可以借學問以培養詞心。文以情生，言之有物，此詞心之醞釀，有藉於其他學問之磨礪浸灌。清詞之盛，所以獨美，斯又其一因，有不可不察者也」。¹⁴¹ 誠然，我們若以細密化、分門別類的學術體制將古人有機的學問切割成一塊塊「文學」、「史學」、「經學」，容易遮蔽了箇中的連繫關係；這些連繫也許是學人有意為之，也許是無意；也許是明顯，也許是隱蔽，都值得疏理清楚。「大而化之」一刀切的概論，只會模糊了學人的深厚造詣，以及簡化了古代的學術生態。有鑑於此，本文嘗試採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望能追溯晚清「詞學」背後的「經學」依據，藉此呈現出清人觸類旁通的深厚學養。

（責任校對：李奇鴻）

¹⁴⁰ 龔鵬程，《中國詩歌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298。

¹⁴¹ 饒宗頤，〈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主編，《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331。

附錄一：《譚評詞辨》、《復堂日記》、《篋中詞》有關政治之詞話

《譚評詞辨》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溫庭筠〈菩薩蠻〉	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	1193
評馮延巳〈蝶戀花〉	必有寄託	1194
評晏殊〈踏莎行〉	刺詞	1195
評歐陽脩〈蝶戀花〉	小人常態，君子道消	1195
評柳永〈傾杯樂〉	忠厚悱惻	1196
評周邦彥〈大酺〉	此亦新亭之淚	1197
評陳克〈菩薩蠻〉	風刺顯然	1198
評王沂孫〈眉嫵〉	寓意自深	1200
評王沂孫〈齊天樂〉	亦寓言	1200
評王沂孫〈掃花游〉	刺朋黨日繁，風刺	1200
評辛棄疾〈祝英臺近〉	託興深切	1204

《復堂日記》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前後十家詞	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	1162
閱黃氏《詞綜續編》	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傳，而比興漸盛	1165
評鄧嶸筠詞	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以新亭之淚，可以規世變也	1170

《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龔鼎孳〈東風第一枝〉	有諷	1208
評李雯〈菩薩蠻〉	亡國之音	1208
評李雯〈虞美人〉	〈九辨〉之遺	1208
評李雯〈虞美人〉	故國之思	1208
評李雯〈風流子〉	同病相憐	1209
評宋琬〈蝶戀花〉	憂讒	1209
評宋徵輿〈憶秦娥〉	身世可憐	1209
評宋徵輿〈蝶戀花〉	悱惻忠厚	1209
評王士禛〈浣溪沙〉	風人之旨	1210
評孔尚任〈鷓鴣天〉	哀於〈麥秀〉	1211
評曹貞吉〈留客住〉	投荒念亂之感	1211
評顧貞觀〈石州慢〉	貧士失職	1213
評徐倬〈金縷曲〉	詞中杜陵	1213
評錢芳標〈水龍吟〉	貳臣倖進，詞人刺之	1214
評高詠〈聲聲慢〉	便爾身世難堪	1215
評朱彝尊〈臨江仙〉	風諭三昧	1217

《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朱彝尊〈金縷曲〉	人才進退，知己難尋，所感甚深	1217
評朱彝尊〈綺羅香〉	刺詞	1217
評陳維崧〈滿江紅〉	失職不平	1217
評陳維崧〈夏初臨〉	故家喬木，語自不同	1217
評沈岸登〈珍珠簾〉	漸開常州一派	1219
評沈岸登〈浣溪沙〉	比興溫厚	1219
評錢肇修〈滿庭芳〉	此危辭也	1220
評王太岳〈憶秦娥〉	紆回隱軫，〈騷〉、〈辨〉之遺	1224
評蔣士銓〈長亭怨慢〉	詩人比興	1224
評林蕃鍾〈玉樓春〉	微詞可悟	1225
評林蕃鍾〈探春慢〉	蕭條溫厚	1225
評沈清瑞〈東風第一枝〉	語含比興	1226
評沈蓮生〈蝶戀花〉	浮雲白日，與此同慨	1229
評張琦〈摸魚兒〉	諷刺隱然	1231
評張琦〈南浦〉	深美閎約	1231
評周濟〈金明池〉	諷詞	1233
評周之琦〈思佳客〉	寄託遙深	1236
評汪潮生〈木蘭花慢〉	〈士不遇賦〉，不徒作孤憤語	1237
評王曦〈憶舊游〉	有諷	1239
評袁祖惠〈金縷曲〉	危苦之言	1241
評王憲成〈揚州慢〉	駭網既壞，海氛又惡，杜詩韓筆，斂抑入倚聲，足當詞史	1241
評黃增祿〈浪淘沙〉	比興	1243
評許宗衡〈霓裳中序第一〉	念亂憂生	1244
評王錫振〈疏影〉	書劍從軍，觚稜望闕，感兼身世，語合情文	1244
評何兆瀛〈壺中天慢〉	神明於《樂府補題》，乃覺賦、比、興皆備	1244
評張炳堃〈湘月〉	工而不縛，寄託遙深	1245
評范凌〈邁陂塘〉	詞史	1247
評郭夔〈淡黃柳〉	金陵陷後作	1248
評馬汝輯〈二郎神〉	士屈於不知己	1248
評姚正鏞〈淒涼犯〉	念亂之言，源於〈小雅〉	1248
評蔣春霖〈浪淘沙〉	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憤厥而作	1249
評蔣春霖〈踏莎行〉	詠金陵淪陷事，此謂詞史	1249

《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蔣春霖〈東風第一枝〉	憂時盼捷，何減杜陵。南國廓清，詞人已死。其志其遇，蓋可哀也	1250
評蔣春霖〈渡江雲〉	詞當作於庚申。前使李謨事，後闕以天寶應之，鈎鎖精細	1250
評王詒壽〈清平樂〉	戀語、癡語，推之忠愛	1253
評高望曾〈一萼紅〉	通於比興	1254
評莊棫〈鳳凰臺上憶吹簫〉	消息甚微	1256
評莊棫〈唐多令〉	二詞皆於時事多槎觸，非苟作者	1256
評馮煦〈一枝花〉	幽咽怨斷，夢華詞境，感遇為多	1257
評徐燦〈踏莎行〉	興亡之感，相國愧之	1257
評賀雙卿〈惜黃花慢〉	忠厚之旨，出於〈風〉、〈雅〉	1258
評鄧廷楨〈金縷曲〉	寓言十九	1265
評鄧廷楨〈高陽臺〉	竟有新亭之淚	1265
評鄧廷楨〈酷相思〉	三事大夫，憂生念亂，敦我之歎，其氣已餒	1265
評黃長森〈踏莎行〉	失職不平，婉曲可以諷矣	1265
評趙對澂〈乳燕飛〉	觸類引伸，人物身世之感，不得以狎詞少之	1268
評趙對澂〈鳳凰臺上憶吹簫〉	〈長門賦〉本是寓言，消息可以微悟	1268
評葉英華詞	託興幽微，辭條豐蔚	1271
評張景祁〈秋霽〉	笳吹頻驚，蒼涼詞史，窮發一隅，增成故實	1273
評徐廷華〈蝶戀花〉	海氛正亟，襍進群言，寓意顯然	1278
評戴敦元〈減字木蘭花〉	清節名臣，情深語婉，希文、永叔之流亞	1281
評儲徵甲〈洞仙歌〉	溫厚悱惻	1281
評黃宗彝〈步蟾宮〉	托興入事	1284
評宗山〈一萼紅〉	一味本色語，為有寄託，樂府上乘	1285
評沈兆霖〈洞仙歌〉	民物之懷，觸緒自露	1287
評吳江三家詞	寓興長短句，是為緒餘，是為正軌	1290
評孔廣淵〈百字令〉	憂患之言，不嫌太盡	1290
評葉衍蘭〈垂楊〉	去國之思，韻合〈騷〉、〈辨〉	1291
評江順詒〈摸魚兒〉	比興真正	1292
評潘鍾瑞〈長亭怨慢〉	〈士不遇賦〉，含淒古淡	1292
評楊葆光〈瑤華〉	杜詩韓筆，凌厲無前，此事自關襟抱	1292

《篋中詞》	內容節錄	《重輯復堂詞話》頁碼
評楊葆光〈沁園春·詠帳〉	寓言身世，侷儻權奇	1292
評汪初〈湘月〉	有春事，有春人，意內言外	1293
評諸可寶〈蝶戀花〉	眾中製淚，澤畔行吟	1293
評汪清冕〈高陽臺〉	此亦令咸城郭之痛	1293
評汪清冕〈齊天樂〉	浩劫茫茫，是為詞史	1293
評楊廷棟〈玲瓏玉〉	體物賦心，可通〈風〉興	1294
評鄭文焯〈摸魚兒〉	名士新亭之涕	1295
評蘇謙〈摸魚兒〉	「濺淚」、「驚心」，杜陵詩句	1297
評蘇謙〈醉篷萊〉	寓興徘徊，深於〈騷〉、〈辨〉	1297
評張僖〈木蘭花慢〉	託興幽遐	1297
評許玉琢〈一萼紅〉	因寄所託	1299
評況周儀〈南浦〉	字字〈離騷〉屈、宋心	1300
評沈昌宇詞	才人失職，侷僚不平，身世多感，託諸倚聲，填詞百篇，皆商聲也	1301
評王廷鼎〈玉京秋〉	託興幽微，聲辭相副	1302

附錄二：《譚獻集》、《復堂日記》有關經世致用之話語

相關文章	內容節錄	《譚獻集》頁碼
〈唐詩錄敘〉	詩也者，根柢乎王政，端緒乎人心，章句纂組，蓋其末也	17
〈金元詩錄敘〉	予輒錄當時憂生念亂之言，以求世變之亟	18
〈明詩錄敘〉	吾觀北地李夢陽，質有其文，始終條理。匪必智過其師，亦足當少陵之史矣	19
〈稼書堂詩敘〉	獻夙謂詩可以觀政，可以觀化。何以明之？賢士君子哀樂過人，以詩為史。風諭得失，陳說疾苦，而當時德禮政刑之跡，閱千載而如見	24
〈雋疏于薛論〉	吾觀《說苑》、《新序》，皆諫書也，封事數上，辭若龜鑑。廣德若以直諫開其先耳，凡此皆經術之致用者也	120
〈尹緯論〉	古之君子，道濟天下，功在萬世	123
〈桐城方氏七世遺書敘〉	其為學也既世，又不為昌狂無涯之言，束經教而推究世用	135
〈謝氏世雅集敘〉	詩者，古之所以為史……丁部之總集，可附於史家	147
〈小雲巢詩錄敘〉	生當近世，無休明之遇，有憂生念亂之所託	155

相關文章	內容節錄	《譚獻集》頁碼
〈春暉草堂詩敘〉	時兵火徧東南，少年意氣，相見輒誦天寶詩人憂生念亂之篇，於是以詩相唱和，以舒憂而娛哀	157
〈徐先生遺文跋與陸祁生書〉	獻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實，曰有用	213

相關議題	內容節錄	《復堂日記》頁碼
閱漁洋文	予服漁洋中和敦厚，可規世運，所謂詩可以觀化者在此	8
論清朝學術	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辭，又好言經世，只為幾、復兩社餘波	18
閱胡石莊《繹志》	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通經致用，命世儒者	27
閱《圍爐詩話》	且二李立言之旨，實不愧於詩史	47
讀褚叔寅、右軒詩文	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為體，有餘為詣，有我為歸，取華落實	48
與樊增祥定交	讀有用書、成偉人，斯光寵耳	64
閱《歷代地理沿革圖》	補六、馬兩家所未備，頗有益於世用	90
閱《尉繚子》	〈將理〉、〈原官〉、〈治本〉三篇，以民事為重，尤為知本	97
閱《湖海文傳》	王侍郎意在考證掌故，故文多翔實有用	121
閱《謙齋詩集》	家世儒術，銳意為世用	139
閱《賭棋山莊文集》	論學頗持漢宋之平，而歸於有用，其言明且清矣	147
閱《味經堂遺書》	《繫辭傳論》依經立誼，旁推文通，致用之學，非經生之業	161
閱《國朝文棟》	所錄皆關係世教，抑亦有實有用者矣	396-39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紹儀 Ding Shaoyi, 《聽秋聲館詞話》 *Tingqiusheng guan cihua*, 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第 3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王國維 Wang Guowei, 《人間詞話》 *Renjian cihua*, 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公羊壽 Gongyang Shou 傳, 何休 He Xiu 解詁, 徐彥 Xu Yan 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 *Chunqiu gongyangzhuan zhush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影印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本。
- 司馬遷 Sima Qian, 《史記》 *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3。
- 左丘明 Zuo Qiuming 傳, 杜預 Du Yu 注,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 《春秋左傳正義》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影印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本。
- 吳翊寅 Wu Yiyin, 《曼陀羅花室詞》 *Mantuoluo huashi ci*, 收入馮乾 Feng Qian 編校, 《清詞序跋彙編》 *Qingci xuba huibian* 第 4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3。
- 易順鼎 Yi Shunding, 《摩圍閣詞》 *Mowege ci*, 收入馮乾 Feng Qian 編校, 《清詞序跋彙編》 *Qingci xuba huibian* 第 3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3。
- 周濟 Zhou Ji, 《宋四家詞選》 *Song sijia cixuan*, 上海 Shanghai: 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 1958。
- , 《味雋齋史義》 *Wejuanzhai shiyi*,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51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 冒廣生 Mao Guangsheng, 《小三吾亭詞話》 *Xiaosanwuting cihua*, 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 《詞話叢編》 *Cihua congbian*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洪興祖 Hong Xingzu, 《楚辭補注》 *Chuci buzhu*, 臺北 Taipei: 頂淵文化 Dingyuan wenhua, 2005。

- 胡安國 Hu Anguo 著，錢偉彊 Qian Weiqiang 點校，《春秋胡氏傳》*Chunqiu Hushi zhuan*，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10。
- 張之洞 Zhang Zhidong，《張文襄公全集》*Zhang Wenxiang gong quanji* 第 6 冊，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63。
- 張祥齡 Zhang Xiangling，《詞論》*Ci lu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 張惠言 Zhang Huiyan 輯，《詞選》*Ci xu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73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章學誠 Zhang Xuecheng，《文史通義》*Wenshi tongyi*，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75。
- 陳廷焯 Chen Tingchao，《白雨齋詞話》*Baiyu zhai cihua*，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 陳匪石 Chen Feishi，《宋詞舉輯論》*Songci juji lun*，收入葛渭君 Ge Weijun 編，《詞話叢編補編》*Cihua congbian bubian*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13。
- ，《舊時月色齋詞譚》*Jiushi yuese zhai citan*，收入葛渭君 Ge Weijun 編，《詞話叢編補編》*Cihua congbian bubian*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馮煦 Feng Xu，《篋中詞》*Qiezhong c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73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修訂本）》*Chunqiu zuozhuan zhu (xiuding 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0。
- 趙岐 Zhao Qi 注，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Mengzi zhush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0，影印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ji* 本。
- 趙爾巽 Zhao Erxun 等，《清史稿》*Qingshi gao* 第 4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
- 蔡條 Cai Tao，《西清詩話》*Xiqing shihua*，收入張伯偉 Zhang Bawei 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Xijian ben Songren shihua sizhong*，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2002。

- 鄭 玄 Zheng Xuan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正義》*Liji zhengy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0，影印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本。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zi yulei* 第 6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錢基博 Qian Jibo，《譚儀所敘董子》*Tanyi suoxu Dongzi*，《叢書集成續編》*Congshu jicheng xubian* 第 37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9。
- 錢儀吉 Qian Yiji 等編，《清碑傳合集》*Qing beizhuan heji* 第 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1988。
- 繆荃孫 Mou Quansun，《藝風堂文集》*Yifengtang wenj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57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譚 獻 Tan Xian，《復堂詞話》*Futang cihua*，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詞話叢編》*Cihua congbia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 譚 獻 Tan Xian 著，范旭侖 Fan Xulun、牟曉朋 Mou Xiaopeng 整理，《復堂日記》*Futang riji*，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1。
- 譚 獻 Tan Xian 著，羅仲鼎 Luo Zhongding、俞浣萍 Yu Wanping 點校，《譚獻集》*Tan Xian j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2。
- 譚 獻 Tan Xian 著，譚新紅 Tan Xinhong 輯，《重輯復堂詞話》*Chongji futang cihua*，收入葛渭君 Ge Weijun 編，《詞話叢編補編》*Cihua congbian bubian* 第 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蘇 輿 Su Yu 撰，鍾哲 Zhong Zhe 點校，《春秋繁露義證》*Chunqiu fanlu yi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2。
- 龔自珍 Gong Zizhen，《龔自珍全集》*Gong Zizhen quanj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75。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 Wang Fan-sen，《古史辨運動的興起》*Gushi bian yundong de xingqi*，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1987。
- 王基倫 Wang Ji-lun，〈「《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Chunqiu bifa*’ de quanshi yu jieshou”，收入林慶彰 Lin Qing-zhang、蔣秋華 Jiang Qiu-hua 主編，《經典的

- 形成、流傳與詮釋》*Jingdian de xingcheng, liuchuan yu quanshi* 第1冊，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07，頁375-414。
- 朱惠國 Zhu Huiguo，〈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Zhongguo jinshi cixue sixiang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著，趙剛 Zhao Gang 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Jingxue, zhengzhi he zongzu: Zhonghua diguo wanqi Changzhou jinwen xuepai yanjiu*，南京 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1998。
- 余治平 Yu Zhiping，〈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Dongzi chunqiu yifaci kaolu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2013。
- 孫克強 Sun Keqiang，〈清代詞學〉*Qingdai cixue*，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4。
- 張高評 Zhang Gao-ping，〈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Chunqiu shufa yu zuozhuan xu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 _____，〈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Chunqiu shufa yu zuozhuan shib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11。
- _____，〈《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以史傳經與《春秋》書法〉“*Chunqiu qubi shumie yu Zuozhuan shuci bishi: yishi chuanjing yu Chunqiu shufa*”，《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45，臺南 Tainan：2014，頁1-62。
- _____，〈比事屬辭與方苞古文義法：以《文集》之讀史、序跋為核心〉“*Bishi shuci yu Fang Bao guwen yifa: yi Wenji zhi dushi, xuba wei hexin*”，《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60，香港 Hong Kong：2015，頁225-260。
- 梁啟超 Liang Qichao，〈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 shi (fu Qingdai xueshu gailun)*，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9。
- 習 婷 Xi Ting，〈龔自珍詞學研究〉*Gong Zizhen cixue yanjiu*，北京 Beijing：清華大學出版社 Qinghua daxue chubanshe，2014。
- 郭延禮 Guo Yanli，〈龔自珍年譜〉*Gong Zizhen nianp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7。
- 陳其泰 Chen Qitai，〈清代公羊學（增訂本）〉*Qingdai gongyang xue (zengding ben)*，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1。
- 黃坤堯 Huang Kunyao，〈龔自珍詞新探〉“*Gong Zizhen ci xintan*”，收入龔自珍紀念館 Gong Zizhen jinianguan 編，〈龔自珍與二十世紀詩詞研討會論文集〉*Gong*

- Zizhen yu ershi shiji shici yantaohui lunwenj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09, 頁 174-193。
- 黃開國 Huang Kaiguo, 《公羊學發展史》*Gongyang xue fazhan shi*,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2013。
- 楊柏嶺 Yang Boling, 《龔自珍詞箋說》*Gong Zizhen ci jianshuo*, 合肥 Hefei: 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 2010。
- 葉恭綽 Ye Gongchuo, 《廣篋中詞》*Guang qiezhongc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11。
- 管 林 Guan Lin、鍾賢培 Zhong Xianpei、陳新璋 Chen Xinzhang, 《龔自珍研究》, *Gong Zizhen yanji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4。
- 樊克政 Fan Kezheng, 《龔自珍年譜考略》*Gong Zizhen nianpu kaolue*,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4。
- 錢 穆 Qian Mu,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 sh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96。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 《管錐編》*Guanzhui bian* 第 3 冊,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1。
- 龍榆生 Long Yusheng,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Jin sanbainian mingjia cix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79。
- _____,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Long Yusheng cixue lunwe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7。
- 謝桃坊 Xie Taofang, 《中國詞學史(修訂本)》*Zhongguo cixue shi (xiuding ben)*,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2002。
- 嚴迪昌 Yan Dichang, 《清詞史》*Qingci shi*,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1。
- 饒宗頤 Rao Zong-yi, 〈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Lun Qingci zai cishi shang zhi diwei”, 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bianweihui 主編, 《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Diyi jie ci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eichu, 1994, 頁 315-334。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 《中國詩歌史論》*Zhongguo shigeshi lu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8。
- Yim, Lawrence C. H.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oi: 10.4324/9780203878781

The *Chunqiu*, the Gongyang Scho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Ng Chi Li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cl.ng@hkuspace.hku.hk

ABSTRACT

There is a famous saying about *ci* poetry in the Qing: “*Ci* 詞 originated from the *Gongyang* 公羊.” The person who said this is unknown, but it was likely spoken by someone who perceived various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Chunqiu* 春秋, the Gongyang school of exegesis and Changzhou 常州 *ci* poetry. In this regard, statecraft and the rhetoric of “subtlety” probably weighed heavily on Tan Xian’s 譚獻 (1832-1901) mind when he consider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This not only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Gongyang scholars took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as their ultimate concern.

Key words: *Chunqiu* rhetorical strategies, *shuci bishi* 屬辭比事, the Gongyang School, late Qing *ci* poetry, Gong Zizhen 龔自珍, Tan Xian 譚獻

(收稿日期：2016. 7. 19；修正稿日期：2016. 12. 22；通過刊登日期：2017. 6. 19)

